



## 以法定责补短板

文/评论员

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首次提请审议。这意味着,推进乡村振兴将上升为一种法定的责任。

我国现有的涉农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涵盖范围以农业为主。颁行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而涉及乡村发展的其他方面的立法则处于相对空白状态。过去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处于弱势地位,从农民利益受损到生态环境破坏、耕地流失和减少等等屡见不鲜。乡村振兴促进法有望补上乡村建设法治化短板。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立足于发挥好乡村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保护生态和环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特功能,从法律制度上促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草案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工作机制,其核心内涵与主要抓手为“五大振兴”,即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草案还明确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承担促进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以及每年上报实施情况,层层压实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确保各项投入和措施落实到位。草案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法律来保障农民与乡村、乃至所有参与乡村建设者的利益,会极大助力社会发展红利从城市

扩展到农村,为乡村建设创造重大机遇。发达国家城乡均衡发展与此有很大关系,典型的如日本有专门法律。在乡村振兴方面,日本有1952年后陆续制定的《山村振兴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備法》《半岛振兴法》等促进农村地区、特别是落后山区发展的法律。1999年,又以《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取代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将“农村振兴”确立为基本理念。在生态保护方面,有《家畜排泄物法》《持续农业法》等法律。在三产融合方面,有《六次产业化·产地直销法》《股份公司农林渔业增长产业化支援机构法》等法律。在农业投入方面,有《农村现代化资金促进法》《农业改良资金促进法》《低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优惠法》《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等法律。在美国,乡村、农业、农民发展法律被赋予与其他行业平等的地位。近年来美国的新农业法案,在为乡村发展提供基础性动力之外,逐渐增加了农村居住社区建设、农村合作组织培育、多元经济发展、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农村互联网建设等方面内容。

以乡村振兴促进法立法为契机,作为今后乡村振兴的一件大事,完善我国农业农村立法任重道远。一方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发达国家大都是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在乡村振兴领域布局立法,有些国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前就颁布了振兴乡村的法律。从法律数量和层次看,基本上都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法律群。为确保法律便于实施,常附有详细的配套规定。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各国乡村振兴立法的整体趋势是内涵越来越丰富,逐渐从重视农业产业发展到重视农业农村全面发展,从重视经济发展到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形成包含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乡融合、乡村发展、农民权益保护等多方面法律法规体系。“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对于通过立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们应高度重视,持之以恒进行不懈努力。

# 北京农村经济

2020年7月号

主管/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办/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编委会名誉主任

李志军

主任

康森 张光连

副主任

曹四发

常务编委

孙进军 张士功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旭 张英洪

邢贵平 魏惠东

主编

曹四发

执行主编

张英洪

副主编

邢贵平 沈春林

编辑

田立娜 杜兆云

编辑出版 北京农村经济编辑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  
北沙滩7号院3号楼402室  
邮政编码 100101  
电话 64866031、64866082  
电子信箱 bjncjj@aliyun.com  
印刷日期 每月15日  
印刷 北京经典无限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1819-L0060号  
印数 6500册

## 卷首语

- 1 以法定责补短板 评论员

## 特稿

- 4 京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发展历程 黄中廷  
8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京郊农村改革 廖沛  
14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探索文旅致富之路 梁盼

## 乡村振兴

- 20 乡村治理的体系变迁、实践探索和路径选择 龙文军  
26 做好“干部直播带货”后半篇文章 林立  
28 从故宫营造看休闲农业提档升级 赵晨

## 城乡融合

- 30 通州区“雪亮工程”提升副中心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张德启  
35 副中心美丽乡村铺展新画卷 宋庠儒 陈萌

## 互联网+三农

- 37 党支部把门 信息化防疫 杨冬

## 乡村治理

- 39 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 侯军  
41 房山区发挥党建品牌优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卜晓朴 李斯语  
43 密云区垃圾分类成为开门“第八件事” 密云区委组织部

44 延庆区“三个结合”考准考实干部政治素质

延庆区委组织部

46 大兴区健全机制强化农村“领头雁”管理

黄俞创

第一书记

47 因地制宜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北京市第一书记联络办公室

学者专栏

48 乡村文化载体之乡村空间

朱启臻

智库动态·农研 30 年

50 北京市农研中心与密云区签订合作协议

本刊

51 第 40 期农研智库大讲堂:纵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李婷婷

京郊走笔

53 二十二载领头雁 精耕细作风来仪

杨富文

56 门头沟区“五抓五强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符乃清

57 冬奥延庆赛区重点工程将于年底竣工

董明昊

58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成立

张佳玮 赵青

60 珍珠泉乡流苏茶迎来首个采摘季

刘嘉豪

帮扶需求

61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东辛店村等 5 村

城郊动态

63 大兴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农业保险等工作等 5 则

本刊辑



顾问

陈锡文 张晓山 韩俊  
刘守英 魏后凯

发送对象

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领导及相关处室;市农口局级单位、涉农郊区区委区政府、涉农郊区乡镇领导及相关部门;涉农郊区村干部;中央及市属涉农研究部门专家、特约作者;市农研中心。



# 京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发展历程

## ——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简史(一)

文/黄中廷

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曲折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和经济(股份)合作社四个发展阶段。

### 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至1958年)

京郊农村地少人多,多数农户生产资料不齐全,解放以前农民就有换工插犋、相互合作的习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许多青壮年参军支前,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劳力换工、人畜换工等形式的互作组织相当普遍。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北京辖区内的土地改革到1950年3月全部完成。为了实现农业增产目标,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郊区干部扩大会议上发出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在春耕生产中建立了一批互助组。1951年9月,按照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农业生产互助组在郊区农村迅速发展起来。到1954年,互助组发展到0.86万个,参加农户6.1万户,占到郊区农户总数的49%。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尚未并入京郊的10个远郊县1954年有互助组2.77万个。同时,在1952春,郊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试办转向推广,到1955年初达到703个,入社农户占总数的47%。1955年底,入社农户占总数的91%。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尚未

并入京郊的10个远郊县1955年有高级农业合作社5810个。

按照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京郊农村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1月,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上年底的77个发展到427个,入社农户19.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尚未并入京郊的10个远郊县,1956年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367个,90%以上农户加入了高级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土地实行作价入股,农户依据其所拥有的土地股份份额参与合作社年终收益分配,土地性质仍然属于农户私有。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了农户土地股份分红,农村集体土地由农户私有制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制。1956年1月15日,市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2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首都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接受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代表祝贺。市劳动模范李宗和代表农民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农户私有的土地经过高级合作社,转变为本社农户共同共有集体土地,是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创立和集体所有制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郊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从此以后郊区农民群众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经营农业为主,有条件的地方,也开展畜牧业、渔业、林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



但不准经营商业,同时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社员拥有自主经营的自留地。为了完成国家分派的统购任务,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推行了年度生产计划。管理水平较高的合作社将全年的财务收支、劳动用工、劳动日值和钱粮分配等式算到每个社员,做到一年早知道,使社员做到心中有数,调动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政府帮助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中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农具和作物新品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期一般是每天有社干部派活。后来大部分农活改为小段包工。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建立土地、劳动力、耕畜、大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或生产小组使用,实行生产小队小段派工,生产小组劳动作业。搞得比较好的合作社实行劳动定额制度和生产责任制。

据统计,1957年全市(不包含尚未并入北京市的区县)共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28个,入社农户192589户,人口802897人,劳动力271620个,实现总收入12657.6万元,比1955年的3523.3万元增长了2.6倍;实现纯收入8461.5万元,比1955年的2156.7万元增长了2.9倍;实现集体积累1236.4万元,比1955年的204.7万元增长了5倍;集体固定资产达到3406.7万元。

## 二、人民公社(1958年至1984年)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京郊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9月10日,郊区2357个农业合作社(包括当年划入北京市的全部远郊县)合并为政社合一的73个人民公社。从1958年到1984年前后26年,郊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以农村人民公社的形式存在。人民公社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1958年至1961年)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实行“政社合一、一级所有”体制。人民公社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大兵团作战。人民

公社举办公共食堂,农民群众到食堂吃大锅饭。同时取消社员户的家庭经营,收回社员户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霎时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村村土法大炼钢铁、处处深翻土地,大批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农作物疏于管理,加上先后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与1957年相比,196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29.6%,蔬菜亩产量下降43.9%,全年交售商品猪数量下降24.3%,农民人均集体纯收入60元,下降22%,农民生活陷入困境。1959年至1961年成为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三年困难时期”。

(二)人民公社的整顿与政策调整(1961年至1965年)

针对人民公社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1961年以后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颁布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整顿和政策调整。

一是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经过整顿调整,到1962年京郊农村共设立人民公社285个,设立生产大队3704个,设立生产队14818个(平均每个生产队44户),基本核算单位13316个。

二是实行退赔,纠正“一平二调”。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冬到1962年4月,全郊区共向社员群众退赔现金5506万元,占政府和社队平调总数6093万元的90.4%。归还公社化以来拖欠社员的劳动报酬、肥料款和现金投资1061万元,退还农户家具及炊具等47.4万件、家禽1.6万只、大车420辆、耕畜2800多头、树木12.9万棵、房屋24万多间。

三是解散公共食堂,在巩固集体经济基础上,积极发展个体经济。恢复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山,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小片荒地和养鸡、养猪等家庭副业,允许社员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营。恢复和发展集贸市场,允许社员在农村集贸市场上自由出售家庭经营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四是改进和加强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为克服人民公社管理中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混乱以及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共北京市委向



党中央和华北局专题上报《关于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的意见报告》提出,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重要的环节是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实行“三包一奖”要根据不同社队的不同情况,可以多种多样,不强求一律;实行评工记分,要加强劳动定额管理,反对“卯子工”和死分死记;在较大的生产队要划分作业组,固定责任地段和劳动力。与此同时,市区县主管部门利用农闲时间,对社队财会人员进行培训,恢复了合作化时期建立的农村会计辅导网。联系实际对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以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管理的教育。

五是开展整风整社,整顿干部作风。1961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北京市对在大跃进、公社化和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同时,市委分期分批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培训。到1962年3月,共培训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生产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5万多人,联系实际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农联盟、群众路线和形势政策教育。从1963年6月开始到1966年5月,全市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纠正了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次多占、集体账目不清等问题,促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进社队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经过整顿和政策调整,郊区人民公社建立了稳定的生产经营体制,生产生活恢复了正常,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发展。到1965年底,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实现46598.5万元,纯收入达到31644万元,集体积累6431万元,社员集体分配收入77元,分别比1958年增长了53%、71%、212%和45%。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公社(1966年至1984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蛊惑下,在合作社当干部成为一种危险职业。每到年底,大队、生产队干部就要“撂挑子”,公社干部就得去各生产大队、生产队“扶班子”,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无长远计划,导致了集体经济生产经营混乱。以通县麦庄人民公社水南

生产大队为例,全村三个生产队社员分为“大派”和“小派”。“大派”的人当队长派“小派”的社员去播种,本来株距应当6至7寸,“小派”社员故意把株距变成一尺。由于玉米株数不够,年底减产,“大派”队长下台。第二年“小派”的人当队长,派“大派”的社员去追肥,这些社员不把化肥撒地里,故意撒到渠沟里,造成年底又减产,“小派”队长下台。如此循环往复,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少。

同时,人民公社整顿时期形成的体制、政策被批判。一批“三自一包”。把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派”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二批“工分挂帅”“物资刺激”。把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特别是生产责任制说成是对农民群众的“管卡压”,把评工记分说成是工分挂帅,把合法的物质利益说成是“物质刺激”;一些村队包工到组、责任到人生产责任制作为“复辟回潮”的典型进行批判,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三批社队搞工副业。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出“劳力归田、车马归队”,包劳动力全部集中在有限的农田上,严重影响了郊区农村为首都服务的能力。

由于推行错误的政策,导致郊区农村农业连续减产。1969年与1965年比较,全市粮食总产量减少2.7%,油料总产量减少1935%,上交的商品猪数量减少11.5%,社队企业收入减少更多。由于产出下降,收入减少,导致许多社队社员年终收益分配时出现超支、借粮现象,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不但分不到钱粮,还欠下集体一笔债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来的冲击,1970年以后,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相关经济政策,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中央强调,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在保证集体经济发展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中央文件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实施对于恢复和发展郊区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农村政策的逐步恢复执行以及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郊区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郊区农民群众采取“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等形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男女老少齐出动,战天斗地,肩背人扛,挖渠平地,防洪治涝,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加了对农业机械的投入,逐步改进了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76年与1966年相比,郊区粮食总产量增长54.5%。蔬菜总产量增长50.4%,交售商品猪增长了71.4%,牛奶总产量增长15.3%,果品总产量增产36.3%。但是由于开支过大,集体积累增加,农民收入并没有随着农业增产而相应增加。1976年郊区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96元,仅比1965年的77元增加了19元。“文革”十年中,社员每年人均收入增加不足2元,而且出现了一批高产穷队。

#### (四)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1977年至1984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79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市委市政府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从1979年至1981年大力开展推广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工作,开始联产承包到组。采取“四定一奖”方式,即把社员群众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实行“定土地、定产量、定人员、定工分、超产奖励”。从1980年出现了联产到劳力。1981年增加了定开支内容,“四定一奖”变为“五定一奖”。还有地方出现了以产记工、以纯收入记工;边远山区和个别平原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到1981年底,按种植业统计,全市农村有97%的生产队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其中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占73%,小组包工、定额计酬的占27%。生产责任制实行承包到组的占75%,承包到劳动力的占23%,还有少数生产队承包到户。

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安徽等一些省份出现了“包干到户”的新形式,京郊农村也有少数社队进

行了试点。这种责任制形式具有“责任明确、方法简单、利益直接”的优点。但在各级干部中对“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却很激烈。一些人把“包产到户”误解为“分田单干”。市委市政府于1982年7月和11月先后两次召开郊区县负责人会议,具体部署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到1983年北京郊区粮田实行分户经营、包产分配的生产队达到71.7%,1984年达到86.7%,1985年达到96.9%。在实行“包产到户”过程中,市委要求,各地一定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在集体统一计划、统一机播种、统一水利灌溉、统一植保等前提下进行。并规定不准不执行国家计划,不准损害集体财产,不准乱砍乱伐树木,不准陡坡开荒,不能不交提留。自此,郊区集体经济组织确立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多数生产队解体,集体统一经营的职能转由生产大队行使。

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田劳作中解放出来,社队干部精力也从指挥社员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各社队纷纷办企业。1981年,郊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企业发展到5928家,拥有资产11.07亿元,从业人员34.5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实现销售收入14.25亿元(占农村京郊总收入的51.8%),实现利润总额3.1亿元。1984年,全市乡村集体企业进一步发展到1.42万家,从业人员72.4万人,固定资产15.1亿元,实现总收入37.6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2.5倍、2.2倍、3.7倍和3.8倍。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郊区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截止到1984年底,全市有人民公社268个,生产大队4056个,社员107.73万户,参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人口382.91万人,劳动力189.92万个。集体经济总收入69.76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35.28亿元,集体固定资产总值23.14亿元,当年社员人均集体分配654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了6.6倍、6.3倍、1.6倍和5.8倍。

(作者: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原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党支部书记)



##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京郊农村改革

——京郊乡镇企业发展回顾(十)

文/廖沛

随着农业责任制落实,北京郊区有限的土地难以容纳众多的劳动力,部分农民从土地分离出来,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开始奔走于城乡之间,开展多种经营,兴办工副业,很快就赋予了社队企业新的发展内涵。这种新型的社队企业,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改为乡(镇)而改称乡镇企业,在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原隶属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社队企业,是政社合一的产物,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经营范围限于社队内部,而且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分配同农

村各业一样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而新兴的乡镇企业则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不坐铁交椅”,投资少、费用低,有很强的经营自主权。同时,经营机制灵活,适应市场需要,很快就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 一、社队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1978年前,社队企业基本由社队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厂级干部统一任命,职工统一招聘,财务统收统支,财产统一处置,职工报酬统一确定。企业只管生产,职工只管劳动,基本上没有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



经济责任,存在着企业吃社队集体“大锅饭”和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束缚了社队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郊区广大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企业学习农业责任制的经验,从建立和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和企业职工岗位责任制入手,开始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理顺社队集体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使企业经营机制逐步得到转变。

1981年农牧渔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提出社队企业要借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同年10月,市人民公社企业局总结推广了昌平区沙河公社的社办企业、房山县琉璃河公社的社办企业和怀柔县北宅砖厂等“几定一奖”承包责任制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郊区社队企业有6561家推行了“几定一奖”承包责任制,占企业总数8891家的73.8%。如,1983年怀柔县推广北宅砖厂的“五定一奖惩”(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利润、定上交利润,超奖减罚)承包责任制,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当年全县915个社队企业,有841个企业(占93%)签订了这种集体承包责任制合同。当年完成产值7498万元,实现利润1455.4万元,分别比签订合同的指标超出42.6%和36%。这种“几定一奖惩”的承包责任制实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社队集体以经济指标考核企业,比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起到了积极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农村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没有改变,出现了承包的利润指标过低,集体得到的利润较少,个人得到的较多;不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进行“掠夺式”经营;村干部牵头承包企业,得利过高;甚至转让他人经营,集体遭受损失等问题。

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有的企业可以试行厂长承包责任制。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积累属于集体”。“在实行这种承包制时,要防止少数人仗权垄断的现象发

生”。从1984年初开始,各区县把责任制工作的重点,转到了社队企业,从解决公社(队)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逐级建立经济承包责任制,进行了以厂长(经理)负责制、计件工资制和浮动工资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乡村集体企业内部改革首先是处理好乡村同企业的关系,解决乡村对企业“干涉过多,取之过分”的问题。通县的潮县乡提出“多放权,少要钱”,做到“企业是实体,厂长有实权,工作有实效,职工有实惠”。各地在推进这项改革时,重点在放权上做文章,真正使企业拥有自主权,包括生产指挥权、经营决策权、收入分配权以及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等方面的权利。企业内部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管理改革,实行层层承包,健全质量管理和其他管理的制度,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1984年10月,在总结“几定一奖”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市政府农村办公室(简称市农办)制定下发了《关于社队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文件中明确了实行责任制的企业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企业积累归集体;承包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以集体承包(厂长负责)为主,有的可以实行厂长承包,规模较小的企业也可以承包给个人。规定了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指标和期限。明确了收益分配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要加强民主管理和财务管理。郊区社队企业在贯彻落实市农办制定的《规定》的过程中,各县(区)政府十分重视,每年组织县(区)政府直属单位干部下乡进行宣传,指导和帮助企业贯彻落实,社队企业也积极地推行集体承包(厂长负责)或厂长承包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据统计,1984年集体承包(厂长负责)或厂长承包的企业占社队企业总数的54.6%,1985年上升到62.7%,1986年达到了81.3%。“几定一奖”责任制只占11.7%,个人承包的占7%。实行了集体承包(厂长负责)或厂长承包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比“几定一奖”形式进一步健全。一些队办的小企业,实行了集体所有、个人承



包,由能人经营;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厂长负责制基础,发展为招标承包;有些企业有了经营权、招工权、选择副厂级干部的建议权;有些企业承包期延长到三年,有利于克服短期行为;有些企业留利水平提高了,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有些企业可以自行决定职工分配办法,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但是,仍然有相当部分企业存在“三个一”,即承包一个人(厂长),承包期一年,承包指标一个(利润)的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and 农村中政企不分的体制以及眼前利益的驱动,不能正确处理补农建农、企业积累和职工分配的关系,造成了“两头实,中间空”,即上交社队集体利润实,职工分配实,企业积累空(少),影响企业的发展。

## 二、明确社队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

随着社队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企业内部按照职工不同岗位所承担的职能、任务,分别确定了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并把所尽责任程度与报酬联系。

一是实行企业管理人员经济责任制。改革以前,社队企业是参照国有企业的模式,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及管理干部的报酬是按照工分等级或工资等级进行分配,奖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一般没有规定各自承担的经济责任。实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厂长及管理干部的经济责任制。厂长及管理干部的报酬,按照企业整体分配水平并结合承担的经济责任进行分配。厂长一般相当于全厂全员工资平均水平的1至3倍;副职相当正职的70%至80%;其他管理干部的报酬标准是按全厂或一线职工平均分配水平加系数(最多不超过30%)确定。对有特殊贡献的厂长及管理干部,另行奖励。厂长由乡村集体奖励,其他管理干部由企业奖励。企业完不成承包任务,要按承包合同规定对厂长进行处罚;管理干部失职及责任事故,要按照岗位经济责任制的条款进行处罚。如,会计丢失支票、错账、乱账,质量监督人员、保安人员出现质量安全事故等,都要根据责任大小、损失多少进行处罚。这种以岗位量化考核为主

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的实行,有效地贯彻了按劳分配政策,拉开了劳动报酬档次,对于调动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好的作用。

二是实行生产一线工人岗位责任制。改革前,生产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是按等级实行工分制或工资制,基本上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内部实行岗位责任制,生产一线工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企业承包指标分解,分别承包到车间、班组,甚至承包到职工个人,使企业经营成果与职工个人利益紧密挂钩;另一种是根据职工不同的生产岗位,制定生产定额,以及与生产定额数量相关的产品质量和消耗标准计算劳动报酬的方式,一般是实行计件工资制或基本工资加超额奖励。

三是实行后勤及专职人员岗位责任制。对企业供销人员,开始实行岗位责任制时,一般只规定了采购或销售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其报酬参照一线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出差费、住宿费实报实销,伙食费给予一定补贴。后来,对旅差费、住宿费、伙食费基数包干,节约归己,超额自付。最后实行了承包制,按照采购或销售收入一定比例计算劳动报酬,取消了基本工资和差旅费补助。汽车司机责任制,开始是基本工资加里程补助,实行岗位责任制后,一般是实行汽车班组或单车承包,维修和燃油费用包干,节约归己,超额自付,司机劳动报酬按照完成运输量或运输里程计算。对食堂、保卫及其他勤杂人员,按照其工作特点,规定了相应的劳动、服务指标及奖罚标准,其报酬按照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而确定。

通过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实行,企业劳动报酬形式也发生了变化。1975年到1984年,社队企业基本都是参照城镇集体企业的模式,实行八级工资制。根据职工劳动程度、技术高低、工龄长短评定工资等级,按工资等级发基本工资,并按企业效益进行奖励。奖金分一至三或一至五等,有的月评月发,有的月评季发或年发。这种以等级工资为主、奖励为辅的工资制度,职工劳动报酬差别不大,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不利于企业发展。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试行草案)》规定,“从事农村工副业的劳动力报酬,应和在农业劳动的同等劳动力大体相等”。一般实行“厂记等级,队记工分,厂社(队)结算,回队分配”的办法。企业记分办法一般是以技术水平和体力强弱为基础,计定职工等级,每月或每季度将职工出勤天数和计评等级以及相应的报酬返给所在生产队,由生产队直接记工分,同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一起参加生产队的结算分配。经济条件较好的社队集体企业给予职工适当补贴或年终给予一次性奖金。企业管理人员的记分标准,厂长同生产队长相同,按所在生产队前八名劳动力平均数记分,其他管理人员略高于一线生产工人。社队企业实行工分制,回队参加收益分配,由于生产队之间的收入分配水平不同,形成企业职工在厂贡献相同而收入不同的现象。据 1978 年统计,全市社队企业职工 22.6 万人,其中来自生产队并回队参加分配的有 13.6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60.2%;其他职工多数是城镇居民和近郊因占地转居人员,这些职工实行了工资制;全年劳动报酬总额 11086 万元,其中返队分配款 5107 万元,占 46.1%。1982 年,社队企业职工 40.2 万人,其中来自生产队并回队参加分配的职工有 15.8 万人,占 39.4%;劳动报酬总额 28596 万元,其中返队分配款 10280 万元,占 35.9%。

1983 年,农业联产承包制在北京农村普遍实行,社队企业相继建立了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此相适应,社队企业职工劳动报酬由工分制逐步转变为工资制。为调动职工积极性,一些企业根据生产流程,分别制定不同工种和不同岗位的计件工资标准和实施办法,按照职工个人或班组完成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计算劳动报酬。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工资制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4 年至 1987 年,乡镇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在执行城市八级工资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原定工资等级作为标准工资(档案工资),不再调整工资等级,以奖金调整报酬水平。奖励办法一般是按承包指标进行百分考核,以分定值,按月兑现奖励,年终根据企业经营效益状况进行奖罚。这种工资分配形式,使经营好的企业与经营差的企业之间以

及企业职工之间的劳动报酬拉开了差距,对于实现多劳多得、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完善承包责任制,扩大经营自主权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利润按合同约定比例留给企业,增添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对社队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实行承包制初期,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承包指标单一,一般承包合同只规定了完成利润和上交利润指标,造成一些企业拼设备“掠夺”经营,以及有些企业少列成本费用,不提或少提折旧,骗取奖励等现象发生;承包期短,多数承包合同是一年一定,造成企业行为短期化等现象。

1986 年,北京郊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趋于稳定,总收入达到 6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5%;实现利润 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这期间,大多数郊区县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地区性优惠政策。乡镇企业的放权工作有新进展,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开始普遍实现在完成上交利润后,乡村不再从企业提取利润,并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做过多的干涉,使乡、村企业真正有经营自主权,包括生产指挥权、经营决策权、收入分配权以及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等方面的权利。对于长期亏损的小型企业,允许承包、租赁给个人或少数人,个别的还可以拍卖。各区县都试行了股份制,并注意选择产供销条件好的、管理水平高的拳头产品和主导企业做龙头,带动一些同类企业形成企业群体。

1989 年 3 月,市政府召开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了“抓调整、上水平、求效益”方针,要求乡镇企业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增加产值、追求发展速度,转到主要依靠加强企业管理、推进技术进步,挖掘内部潜力、提高效益上来,在调整中发展。郊区广大干部群众贯彻执行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开创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局面。12 月,市委农工委、市政府农办联



合转发了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意见》，各地在认真总结经验，针对企业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一是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厂长(经理)任期至少三年。企业承包指标包括生产、发展、管理三个方面，企业利润上交乡村集体和企业留成比例一定三年不变。据统计，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乡村集体企业 1988 年有 6206 家，占企业总数的 33.4%；1991 年发展到 9547 家，占 65.3%。

二是整顿和完善了个人承包办法。1986 年实行个人承包的乡村集体企业有 1128 家，占 7%。多数个人承包的企业很不规范，漏洞很多。如，有的是乡村干部近亲或凭感情承包，故意压低承包指标；有的只规定了上交利润指标，没有设备折旧；有的承包合同条款不清，甚至没有文字承包合同，只是口头约定。通过清理整顿，规定了发包程序及发包、承包双方的权利、义务，制定了规范化的合同文本，承包上交指标一般都实行了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办法。

三是推行了风险抵押承包。有的是厂长(经理)抵押，有的是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抵押，也有的是企业全员抵押。仅 1988 年就有 3681 家企业实行了风险抵押承包，占 24.5%。增强了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对克服集体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

四是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招标承包。1988 年全市有 2782 家乡村集体企业通过公开招标的办法选择承包经营者，占 18.5%。

这一阶段，郊区乡村集体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改革，开始理顺企业外部关系，落实内部责任制。郊区在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对 1500 家骨干企业采取了“基数包干、定额上交(乡村)，一定几年不变”的办法，使企业有较多留利。有的则采取“递增包干，超利全留企业”“基数包干、超利分成”或“全额利润分成”等办法。对于规模小、生产不稳定的企业则实行了大包干；对长期亏损的小型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给个人或少数人，个别实行了拍卖。这几种形式的承

包经营责任制，都在企业完成了上交利润后，乡村不再从企业提取利润，并坚决下放权力，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任意干涉等。其中部分企业实行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企业素质有所提高，一批农民企业家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还积极试行了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原有集体企业试行股份制，对其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库存物资、产成品、半成品、债权、债务等进行清理，计算出企业创办以来的自有资金、借入资金、国家以减免税收形式的扶持资金，作为乡村集体企业的公股，成立董事会，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企业股东身份参加董事会。各区县为了取得经验，都先搞了试点，特别是对新办企业，一般具备条件的都采取了股份合作制。

#### 四、经营机制转变促乡镇企业良好发展

郊区乡村集体企业经过改革所形成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企业内部岗位责任制，使企业经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转变，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理顺了社(队)企关系，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乡村集体企业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不再随意干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在承包合同范围内，企业有了生产指挥、干部组阁、职工招收辞退、职工分配、资金支配使用和部分财产处置等权力，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从而初步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为调动和发挥企业所有者(乡村集体)和经营者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

二是推动了企业用人制度改革。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促使企业用人制度发生变革，由乡村集体直接任命制改为招聘制，竞争上岗，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据不完全统计，到 1990 年，全市郊区有 3945 家乡村集体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21.6%)实行了公平、公正竞争的办法，择优录用经营者，打破了“铁交椅”，干部能上能下，使一批文化程度高、懂经



营、会管理、年富力强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实现人尽其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克服了企业短期行为。在乡镇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初期,普遍承包期短,承包合同一般是一年一定,使企业经营者心中无底,缺乏长远打算,甚至出现“掠夺式”经营。随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不断健全、完善,延长了承包期限。据统计,承包期限3年以上的乡村集体企业1987年占总数的33.4%,1990年上升到46.2%,1995年达到81.6%。承包期限的延长,使企业经营者相对稳定,便于企业制定和实施长远规划,促使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上规模、上水平。据统计,郊区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乡村集体企业1987年166家,1990年增加到586家,1995年达到1231家,其中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乡村集体企业有932家。

四是改变了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状况。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企业内部岗位责任制的实行,特别是风险抵押承包的实施,使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状况得到扭转。据1988年对510家乡村集体企业调查,其中有150家企业利润比上年降低了34.7%,而职工(包括厂长)工资总额反而上升了0.3%。据此,引进风险机制,实行厂长或企业全员抵押承包成为完善企业承包制和岗位责任制的重点,据统计,1988年实行抵押承包的乡村集体企业有3976家(占企业总数的21.4%),1990年增加到4775家(占26.1%),1995年进一步增加到6116家(占32.5%)。平谷县1989年有755家乡村集体企业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交风险抵押金2150万元,年终对未完成承包任务的企业,扣除厂长风险金2.8万元,扣除职工个人每人风险金135元,从而增强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风险意识,“负盈不负亏”的状况有所改善。

五是较好地处理了集体、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企业留利逐步增加,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据统计,在乡村集体企业税后利润分配中,1988年与1984年相比,上交乡村集体的比例由62.7%下降到47.9%,降低了14.8个百分点;企业留利由37.3%上升到52.1%,留利增加3.6亿元。在企业留利中,用于扩

大再生产的比重由60%上升到79.5%,提高了19.5个百分点;用于职工奖金分配的比例,由35%下降到14.9%;用于职工公共福利的比例,由5%上升到5.5%。1995年与1988年相比,企业净利润上交乡村集体由47.9%下降到39.8%;企业留利由52.1%增加到60.2%。企业留利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由79.5%上升到86.3%,提高了6.8个百分点;用于职工公共福利的比重由5.5%上升到6.5%,提高了1个百分点;用于职工奖金分配的比重由14.9%下降到7.2%,降低了7.7个百分点。

1990年4月,农业部发布了第16号令《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9月市政府农办在总结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0年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下发了《北京市贯彻农业部〈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了上交乡村集体企业的利润比例一般不得超过30%,职工报酬总额增长速度必须低于利润的增长速度和不能超过计税工资及税后利润的15%;规定了承包者离任时必须进行离任审计。随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日益完善,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多乡村集体企业以承包利润指标为主,以产品质量、资金使用、资产保值增值等指标为辅,制定企业职工计酬办法,如联利计酬法、收入(或产值)工资含量计酬法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控制不超过利润增长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厂级干部报酬水平一般相当于职工平均报酬水平的1至3倍。效益工资制促进了职工关心企业效益和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企业发展。1992年,部分乡镇企业逐步推行了股份合作制,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除领取劳动工资报酬外,年终根据企业经营收益,按职工所持股份,分享企业盈利。1994年1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条例》,从而使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走上了法制轨道,促进了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作者: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调研员)



#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探索文旅致富之路

——房山区南窖乡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

文/梁盼



2018年9月22日至24日,首届“遇见南窖·慢品西山”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在房山区南窖乡惊艳亮相,炫耀京华,成为京西南一席人文视听的饕餮盛宴。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南窖乡再接再厉,第二次将“西山民俗文化节”的大旗扛起,使“文化节”成为一个持续展示西山民俗民艺的舞台。

在南窖乡这个舞台上,“历史文脉珍品展”、“花会”演出、驼队走街、非遗展示等诸多项目,全都活灵活现地融入“门当户对”的建筑、原汁原味的古街之中,使人们穿越时空,回到民国,回到明清,回到梦里

的古典家园。央视新闻频道、新华社、“党报头条”等大型媒体进行积极报道,使南窖乡揭开面纱,走出深山。

## 1

北京西山,又称小清凉山,是太行山北部的余脉,古有“太行之首”称谓。西山形如蛟蟒,起伏壮阔,如一道长城拱卫北京城,故又有“神京右臂”之誉。

有山必有沟,有沟必有河,西山在房山地区有两条母亲河,即“北沟”的大石河与“南沟”的拒马河。两河对望之间,山峦毗连,前岩呼,后崖应,北沟向南鸣



咽,南沟向北叹息。这两条河,虽缠绵裹挟,但从未握手相汇,于是两河之间便独立为大西山的一个次级单元,即“大房山”。

大房山有主峰,呼为猫耳山。猫耳山,山名萌哒可爱,颇有网络时代之特色,但它不是现代人命名的,盖因其山巅有二峰凸起,似一只猫的两个耳朵,才如此“现代”。而这猫耳山西麓便是南窖乡了。值得一提的是,猫耳山另一边,也就是东麓,恰是金代皇陵“金陵”的遗址所在。

南窖乡,位于房山区西北部,方圆40平方公里。面积虽不大,但处处皆风景,山山有人文。明代伊始,从北京地区到山西省的人员物资往来,必须穿越绕指柔一般的京西山路,而南窖,便是这京晋大商道上的要冲之地。南窖乡政府所在地的南窖村,更是猫耳山脚下的一颗明珠,它因煤而兴,民国时期曾是房山的“九大商镇”之一。

“南窖”之名,据文史学者杨亦武考证,要以《金史》为准:从金陵所在地的“坟山”——即与猫耳山毗邻的云峰山,过“辘轳岭”,有“南郊涧道”隔断山势。此“辘轳岭”就是今猫耳山的东大岭,“南郊涧道”即南窖沟——南窖东边的一道大山沟。后来,“南郊”流变为“南窖”,村名即源于此;南窖乡,亦随南窖村而得名。

村与乡同名,但绝对不能混淆。南窖村位于南窖乡中部,面积9.53平方公里,全乡四分有其一,全村赫赫3000余人,在整个西山一带都是罕见的人烟稠密之地。南窖整个村子深藏于西山地区一块可遇不可求的“小平原”上,举目四野,尽皆峰峦,故又可谓盆地村落。因这盆地天然受到群山不可捉摸的“压制”,造成村庄东西方向两个出入口显得很“局促”。更有趣的是,这两端“局促”的中间地域,却一下子豁然开朗,使先民可资利用的平地骤然增多,甚至大有“茫然不知所措”的空旷与寂寥。

从地图上看,南窖村“口狭腹阔”,形似扁舟,状如元宝。从古至今,村庄规模不断扩大,但“元宝”模样始终未变,仿佛千年“窖”藏于斯。正因有这窖藏于深山谷地的“宝贝”,所以南窖的“窖”字,便有了新的解读。

另外,在“窖”南、“窖”北、“窖”东、“窖”西四个方位的山上,各挺立着一棵坚毅的榭树。榭树,别名橡树、金鸡树,又俗称大叶波罗树,南窖先民取其谐音叫“波罗树”,后又“讹变”为今天村民口中的“玻璃树”。玻璃树质硬难裂,可做家具,其叶可食、可养蚕、可入药治吐血等疾病。

玻璃树还颇有灵性,能压邪纳福,南窖村民将其敬为风水树。《周礼》说:“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大圭是周天子所执的玉质手板,“终葵”即为玻璃树,“终葵首”则指用榭木制作的圭柄。玻璃树是吉祥物种,古代诗人亦常提及,譬如晚唐大文豪温庭筠就有“榭叶小迷路,枳花春满庭”的妙句。

南窖村内私塾、拔贡院、古庙、古戏楼、古壁书等古典建筑星罗棋布,相互映衬。在四棵玻璃树厚重的凝望下,更有一条保存较为完好、长达1200米的古商街,即“元宝”内部的主干道。当一座座古商镇在人类改天换地的进程中悄然消失时,南窖村却意外保存了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成为西山乃至整个华北山区古商镇的活标本。2016年,南窖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 2

南窖古街上的寺庙、宅院与店铺乃古街之菁华所在,值得一道来。“娘娘庙”为南窖村最早的庙宇,庙内外现存多株参天古树,皆有六七百年高龄。娘娘庙坐落于南窖村西头,人们便称之为“西庙”,供奉着道教的山神“碧霞元君”。庙东侧为村口的“门楼”,其形制类似于古代的城门,当地人呼曰“过街楼”,或“瓮桥”。

清道光年间(1821—1850),村内大小商户较多,纳税总额很大,某些小商户则税负较重,颇为艰难。鉴于此,村内多家豪门富户便联合成立“仁义局”,揽下所有商户需上缴的税银,此举大大减轻了众商户的纳税负担,极大提高了经营动力。为表感念之情,众商户在娘娘庙立下“仁义局碑”,只可惜此碑后来被洪水冲走,荡然无踪迹。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村人在娘娘庙内再次立起“重修仁义局碑”,碑头两面分别刻有



“义著千秋”与“仁垂万古”等字。

娘娘庙有前后两殿,建筑规模较大,解放后,它还为粮店、小学校、幼儿园、党支部、村公所等各种机构提供过房屋场地,可谓“鞠躬尽瘁”。2019年秋,第二届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举办期间,娘娘庙有大作为,南窖乡的“历史文脉珍品展”在此举办。展览以乡域为范围,以历史为脉络,用实物做支撑,系统回顾了南窖乡的“前世今生”。一个乡镇居然有此等展览,可见南窖地区是绝对有料可挖、有史可托的,效果自然大受欢迎,游客无不点赞。

“古戏楼”位于娘娘庙的斜对面,建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光绪十年(1884)重修。戏楼为砖木结构,坐南朝北,背倚“南山”,面村临河。戏台尺寸约40平方米,雕梁画柱,甚为别致。

“背楼子”建筑年代不详,因其后墙对着“过街楼”,便得此名。又因其坐北朝南,正对着河沟另一边的古戏台,故还有“观戏堂”之称。不过,在这个“堂”观戏的,除了人,还有神。事实上,“背楼子”起初就是神仙崇拜的产物:为村内庙宇供奉的龙神看戏而建。以前,每到逢年过节唱戏时,村民就会把几位龙神请进“观戏堂”,散戏后再将其恭送回庙里。

“拔贡院”位于村西,房主为清代贡生赵联魁,其官居七品,颇有声望。明清时期,为解决秀才考不上举人、没有出路的大难题,朝廷便令各府州县推荐突出的秀才入京师国子监,然后经统一考试,合格者即可走上仕途之路,这个制度便称为“拔贡”,其受益者即为“贡生”。“拔贡院”坐北朝南,三进院落,窗棂做工极为精致,属典型的明代建筑。

提及赵联魁,就必须说一说南窖村的“虎头牌”与“黑红棍”。虎头牌与黑红棍皆为古代官员专用,前者为皇权象征,路人见之须避让,后者为封建社会衙内大堂差役行刑用具。清同治年间,赵联魁为方便乡民出门上香,特请同窗好友、涿州总兵禀报朝廷,获御赐虎头牌两面、黑红棍一双。此后,每年村里有进香走会等重大活动时,御赐的“牌棍”便在队前开路,以示威仪。虎头牌由金丝楠木制成,上雕虎头,高七尺三寸,黑红棍长五尺九寸,棍体两头一尺五寸处刻

有隶书“御敕”二字。其精美仿品现存于南窖村西首娘娘庙内。

“北极玄帝庙”建于明朝初年,南窖百姓称其为“真武庙”,其雄踞于村庄的中心地段,坐北朝南,所以其东方正好是“左青龙”,西方是“右白虎”,南方是“前朱雀”,而它自己便是坐镇北方的“后玄武”。玄帝庙的山门前,一道影壁临古街而立,上面嵌有一个大大的砖雕“福”字。每逢初一、十五、春节以及民间重大节日时,南窖地区的狮子会、中幡会、银音会、大鼓会等民间“花会”皆齐聚玄帝庙,尽情表演,娱人亦自娱。

“李家秀才院”位于古商街中段位置。清同治年间,李家的长兄李霖、三弟李棠分别考取了秀才,乡党随即赠予李家昆仲“泮水芹香”与“花萼相辉”两块匾额。长兄李霖除了是“泮水芹香”的秀才之外,还精通医术,且人品高贵,可谓儒医之典范。当年,李霖治好了通州王府格格的重疾,王爷为表谢意,执意要帮李霖在京城前门外开中药房。可李霖婉拒,遂回南窖老家,继续悬壶济世于乡土。王爷大为钦佩,专门差人到南窖,送李霖“儒医济世”匾额一块。

营业于古商街北侧16号的“孔记钱庄”,主要做存贷款生意,乃古代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老板是孔祥贵和孔祥富两兄弟,其原籍山西,富甲一方,据说与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家族是同宗。

### 3

大房山,燕地名山,原名“大防山”。房山在金代为奉先县,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更名房山县,“大防山”遂跟着改名为大房山。猫耳山周边万木葱茏,幽谷迷人,早有“大房耸翠”之盛誉。从元至清,房山便有新、旧八景之说,但不管“新旧”,“大房耸翠”均列首位。

有好景,便有妙诗,这是中国山水文化的一大传统,明代诗人张才曾为大房山题曰:胜景非凡堪纵目,一时良匠亦难描。清代康熙年间,房山县令佟有年抓住抚民于房山的大好机会,也对这“一时良匠亦难描”的大房山予以渲染:翼翼神京抚大荒,天开东序与西房;冠汤切云当岌岌,儿孙拱护尽苍苍。



佟有年是房山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父母官，不仅“房山八景”皆有其题诗，而且致力于房山史地文化，康熙三年版的《房山县志》便是他修撰的。县令在前，皇帝补后——百年荏苒，乾隆皇帝临幸大房山、祭祀金陵。乾隆一生酷爱诗词，他不来则已，来了当然要提笔：在“冠汤切云当岌岌”的惊险刺激之中，乾隆皇帝吟出《望大防山歌》，其开篇四句曰：太行连延西南来，千支万派纷纭回；房山于此独称俊，拔地秀拥金堂开。

好个“房山于此独称俊”，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为何“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乾隆皇帝对此山此地钟爱有加？无他，因为这里融野趣与人文于一体。

猫耳山顶，还有绝世而立的崇圣宫。崇圣宫是为金章宗修建的高山行宫，俗称金章宗歇凉台，为的是让金章宗在金陵祭祀先祖时，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章宗曾 12 次拜谒金陵。金章宗，汉名完颜璟，金代第六位皇帝，泰和八年（1208）病崩，时值壮年 41 岁，葬于道陵，即今天金陵“金台夕照”的遗址景观处。

当其时，金朝承平已久，皇位继承自有子孙后来人，可不巧的是，金章宗的 6 个儿子都在 3 岁前夭亡，皇位最终竟然由其叔父继承，正可谓“逆向继承”。而且，金章宗死后，金帝国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下坡路。26 年后，金朝在南宋与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下寿终正寝。可见，金章宗的“歇凉台”带有一抹浓浓的悲情色彩。

金朝，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于 1115 年创立的朝代，建都于上京会宁府，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1125 年，励精图治，建国 10 之后，金灭辽，两年后再灭北宋。再过 28 年，即 1153 年，金政权的都城从苦寒偏远的上京南迁至“中都”，即今北京。金朝迁都北京，是北京真正意义上的建都之始，距今已 866 年——之前的辽代，北京地区为“燕京”析津府，或称“南京”，只属于陪都性质。

力主迁都北京的是金代第四位皇帝“海陵王”，他排除各方阻力，强令女真贵族和大臣离开熟悉的白山黑水，离开建都已近 40 年的故乡上京，然后义无反顾，向南行进约 2500 里，奔赴前朝辽国的“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为了达到长期定都北京、经营北京、繁荣北京的目的，海陵王一不做二不休，紧接着决定将

原在黑龙江阿城的祖陵迁至北京，后经过他全程的大力督促，终于选定陵址：中都城西南方向约 100 华里、九条山脉蜿蜒而下的“云峰山”。这云峰山，便紧邻大房山的主峰猫耳山。

海陵王对这块陵寝十分重视，建设期间曾多次前往视察。从海陵王一朝开始，经过 60 余年持续营建，金陵逐渐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但明朝末年，后金，即后来的清帝国，起兵反明，明军节节败退。金陵的墓主，乃清人无可置疑的远祖，于是天启皇帝就认为，是清人的“祖坟”金陵“王气”太旺盛，压制了大明运势。这样，天启皇帝一怒之下，派兵捣毁了金陵。而猫耳山顶峰那座给金章宗“歇凉”的崇圣宫，自然也灰飞烟灭。海陵王的毅然决绝，塑造了房山地区厚重的文化底蕴，也为南窖注入了一股北方帝国的豪迈与辉煌之气。

#### 4

唐末，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在大安山建立“大安馆”，开辟华北通往塞外的道路，其中一条经红煤厂过南窖，再越猫耳山至周口店镇所属的黄山店，最后向南出山到达平原。这条从唐末开始出现的山路，正是后来元明清时期从山西到北京的商道雏形，而南窖恰在此商贸要道跨入北京平原地区的关节点上。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幽燕之地的藩镇大佬开了先河，后人继往开来，一波一波的商人与旅客，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西山深处，将这条通往平原地区的要道踩得更宽，碾得更深。在南窖村附近的山路上，至今还存有诉说当年熙熙攘攘、繁华喧嚣的“蹄窝”。所谓蹄窝，就是驴骡长期脚踏山路的某个固定点而留下的深厚“印迹”，其中有的蹄窝甚至深达 10 余厘米。

除了商道蹄窝，南窖还有“都统之印”。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南窖村，一个村民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挖出一枚铜铸印章，上面刻有阳文九叠篆书“都统之印”四个字。此印底座为正方形，边长 8.5 厘米左右，厚 2 厘米上下，印把长约 4.7 厘米。后经考证，此印为金代官印。



“都统”，金代武官之名号。据《金史》记载，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猛安”为女真族特有的军政合一之官名，属高级别的地方军政大员。这枚“都统之印”对于小小的南窖地区来说，具有一种很强的历史厚重感，故此“都统之印”，又可誉为“南窖之印”。

水峪村，与南窖村毗邻，明初成村，民居大都建在山坡上，但布局颇讲究，有易学之理渗入其中，总体呈自发形成的圆形八卦布局，奇极妙极。水峪有以古民居、古石碾、古商道、古中幡为主体的“四古文化”。村内现存明清古建筑 116 套 600 余间。石碾则多达 128 盘，曾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收藏石碾之最”，现存最古老的石碾“开盘”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

耍“中幡”，或曰舞“中幡”，起源于晋代，起初为皇家表演项目，后传入民间，融体育、游艺与杂技于一体，目前在北京得到较为完整与系统的传承，北京天桥的中幡表演为其翘楚。享誉中外的“水峪中幡”，采取男女同台表演的方式，既气势宏大，又别具细腻之美。2007 年，水峪中幡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先后参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垫场演出、国庆 60 周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活动。

水峪有浓厚的耕读文化传统，历史文人辈出，村内的“先生院”“学坊院”“德善堂”等以教化为己任的院落，无不诉说着先民文以载道的殷殷之盼。2012 年，水峪村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5 年获“全国生态文明村”称号。

## 5

近现代史上，南窖地区有两个“奇观”。首先是“高线奇观”。

房山“高线”，是中国第一条以蒸汽为动力的空中运煤缆车，在中国乃至亚洲交通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由天津商会向外国银行借款 300 万两白银在房山高线开始修建，1911 年投入运营。

高线共有三条线路，最主要的是“坨清高线”：东起坨里火车站，经口头、万佛堂、半壁店、英水等村至南窖“清港沟”，总长 26 公里，日运煤 500 吨，乃名副其实的晚清“亚洲工业奇迹”。

南窖地区的第二个奇观为社会主义的“花港洞渠”。花港（读“蒋”声）是隶属于南窖乡的一个行政村，距乡政府驻地南窖村仅 5 公里。40 多年前，这里极度缺水，为解缺水之困，当时花港村党支部书记蒲天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在北大尖儿半山腰打个洞，把山后的大石河水引进村。蒲天佑将这个“石”破天惊的妙招一说，就得到了全体村民一致赞同。

于是，蒲天佑带领村民日夜苦干，硬是开山凿出一条总长 435 米、宽 2 米、高 1.8 至 2 米的洞渠，用顽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让村民喝上了大石河水，也让之前贫瘠的山地史无前例地种上了小麦，更让名不见经传的花港村有了一条“北京的红旗渠”。这一享誉京华的壮举，铸就了苦熬不如苦干的“花港精神”，蒲书记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参加了 1974 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

在 2019 年秋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上，花港的 9 位村民以这惊天动地的引水工程作为故事原型，表演了情景剧《我们村的红旗渠》。

南窖乡不仅有工程奇观，还有轰轰烈烈的抗战奇观与革命奇观。七·七事变后，因南窖是高质量无烟煤的产地，日寇便大举侵入，在南窖成立“大编乡”伪政权。日军在南窖地区设重兵防守，修建多个岗楼与炮楼。其中南窖村北坡岗楼规模最大，在山顶大平台的西南角，共 3 层，高 3 丈多，墙厚 1 米，由日军一个中队驻守。

1938 年 3 月，八路军代表、房涞涿联合县游击大队长包森翻山越岭来到南窖，成立了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此为房山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伍。从此，南窖地区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并最终在南窖打造出房山县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南窖地区依托煤炭产业，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特别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亦有“奇观”，先



进人物频出,譬如近年来水峪村那三位能书善诗的老雷锋便声名远播:80岁的党员杨万俊坚持13年为村内老人免费送豆浆;同样80岁上下的王庆月为游客免费制作拐杖1500余根;70余岁的杨守安在石板上写诗数百首、宣扬民俗风情。2019年,新华社以《小山村里的雷锋爷爷:就是想做点好事》为题对他们进行了报道,网络点击量多达50万次,好评如潮。

## 6

南窖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南窖和水峪两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更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民艺民俗的代表便是绚丽多姿、精彩纷呈的“花会”。

这花会的“花首”便是“银音会”。所谓“银音会”,分两种表演方式:一是众民间乐手一边走,一边敲着云锣、吹着笙笛、打着大镲小镲——这在南窖俗称“踩街”,主要演奏于村中求雨、“二月庙”上香、春节、元宵等特殊时日;二是“坐场”,即村内富户娶亲、聘女、庆典时,入户坐场表演。

银音会始创于南窖村,也是南窖地区较早的花会之一,可追溯到明朝初年,有几十个曲子流传至今。说到银音会的乐器,必须提及“大镲”——铜制,呈草帽状,直径约60厘米,两片镲叶分阴阳,演奏时两镲碰击,发音出响。南窖村内现就有这么一只大镲,上铸有“大明宣德五年内加金银造”字样,字旁刻有鎏金龙两条、绣球一只,还有一个花边“寿”字居中。此镲工艺精美,品相上乘,原本是一对,另一只在民国年间赴西山名村的黑龙关表演时,不慎脱落摔毁。

“灯笼会”始于明末清初,是南窖村独有的民间花会。每逢年关和元宵,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灯笼从村西口的娘娘庙一直挂到当年村东的东瓮桥。灯笼会分为“四教”,分别是青龙教、黑龙教、雨神教、火龙教,统一归会首领导,四教也有分教会首。

“狮子会”成立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末民初时,耍狮艺人多为南窖村李姓、霍姓、董姓这三家的青年小伙。狮子会用两头狮子一同表演,黄狮为雄狮,蓝狮为雌狮。表演形式千变万化,共有摇头摆尾、掏耳

朵、退洞入洞、滚绣球、探海等30多个套路。

“逛灯城”,又称“逛灯阵”。灯城旧址位于南窖村中央玄帝庙东侧,现乡中心小学院内。灯城有中心的天灯1盏、门灯3盏、城灯361盏,共计365盏,代表一年365天,按世代口传心授的灯图摆设,有十面埋伏、九曲黄河、九宫城、八卦图等阵型,每年更换一次。逛完灯城要走1.08里,暗含12个月、二十四节气、72候共计108种变数。2018年与2019年的两届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都在南窖村复原了这种灯城,因其融民俗与游戏于一体,成为游客参与度颇高,甚至乐此不疲的游艺项目。

南窖地区民风淳朴,人文璀璨,历史上属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山区。但是2010年南窖乡响应国家政策、关闭煤矿后,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可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让挖煤,南窖便开始探索文旅融合的崛起之路。

尤其最近几年,在以王化占同志为班长的南窖乡党委的带领下,广大干部与群众奋发图强,通过连续承办两届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的活动,系统全面地梳理出南窖本地的文化资源特征,并结合乡情村况实际,对乡域范围内的古建筑、古街道进行了保护与修复,也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施行了富有成效的举措,更在招商引资与利用外部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为南窖乡的发展注入了无穷动力。面对关闭煤矿后得以恢复的“绿水青山”,面对这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面对房山区委区政府对南窖“京西历史文化名乡”的定位,西山深处的南窖乡定能形成属于自己的文旅产业与绿色产业,南窖老百姓也定能拥有不亚于平原地区的“金山银山”。而山里山外的所有人,势必看到一个韵甲西山、趣甲西山、富甲西山的新南窖。

(作者:房山区南窖乡南窖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作者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窖乡党委书记王化占、组织部部长刘杰、宣传部部长王娜薇、地域文化学者付向东等人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乡村治理的体系变迁、实践探索和路径选择

文/龙文军

乡村治理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稳定,一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 一、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乡村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的是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有的是以专门的法律法规提及,有的是在一些党的会议文件中提及。从乡村治理目标看,总体朝着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从乡村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来看,乡村治理一直是遵循乡村内在的发展

规律,为服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而不断创新。

#### (一) 乡村治理的主体变迁

乡村治理的主体是乡村治理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人民公社解体,农民个体地位越来越突出。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实行“乡政村治”治理新体制。乡村的治理主体是村民委员会,负责维持农村社会治安、组织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

施,1998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做了修订。作为群众性民主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职能逐步扩大,帮助村民在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事务中实现自我管理,保障村民自治,探索农村民主实现形式。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八大以后,农村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2013年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使合作社成为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抓手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落实



政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村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村治理的牵头主体。

当前乡村治理主体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合作社、社区红白理事会、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各类农村企业等。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朝着规范化、法治化方向不断发展,各类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这些主体的出现既是创新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需要,也适应了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内部差异性治理的要求,他们共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乡村治理活力不断体现。

### (二)乡村治理的客体变迁

乡村治理的客体指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各类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矛盾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20世纪80年代,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收缴农业税(以前称为“要钱”)、抓计划生育(以前称为“要命”)等,以及相关的突发群体性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旧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如在村委会选举、村务公开、小官巨贪、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农民和干部的矛盾几乎是针尖对麦芒。进入新世纪,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再成为“三农问题”焦点,而在处理土地承包流转、征地拆迁补

偿等问题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即成了主要矛盾。当前,土地流转、补贴分配、农村公共服务等都是治理中碰到的突出难题,部分地区由于片面强调农村维稳而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农村的信访行为。

从当前来看,乡村治理的客体已经从以前的“要钱要粮要命”转移到现在的土地流转、村庄公共服务、各类补贴分配、集体资产管理等具体内容上来了。这些矛盾存在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政府社会保障的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之中。深入梳理这些关系之后,对乡村治理的客体就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 (三)乡村治理方式的变迁

乡村治理方式是指主体应对客体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农民分工分业,土地承包经营权慢慢发生流转,农村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不同时期出现的矛盾各不相同。在解决各种矛盾过程中,乡村治理方式也在不断探索,从引导农民自主开展生产,再到以村委会为主体的自我管理,农民的民主意识得以明显增强,解决各类矛盾的方式一般以堵为主。2004年,在农民负担最重、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此后每年都聚焦三农问题,不断探索以“疏”和“堵”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三农”矛盾,建设农村民主关

系、理顺干部和农民关系。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6年彻底废除农业税,农民负担逐渐减轻,土地流转承包关系不断发展并趋于稳定。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村民自治建设,2007年提出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2008年提出要探索乡村有效治理机制,2010年提出要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2013年提出要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2014年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2016年提出要完善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2017年提出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和建设平安乡村五方面做出具体部署。

当前农民与土地、与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高度依附转向相对独立,从被管理转向民主议事,乡村治理方式从以堵为主转变为疏堵结合,不断创新,逐渐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吻合。

### (四)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乡村治理理念是指主体对乡村治理的观点、看法和信念。随着主体和客体的新变化,乡村治理面临新情况,不同时期治理理念有一定的差别。在改革开放初期,既要面对人民公社遗留问题,又要以改革的勇气调整生产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



下,乡村治理就必须围绕变革农业生产体制和经营体制,开展村民自治的探索。因而,乡村治理中行政指令色彩不断减少,农民的自主性逐渐增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加重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进城,三留守(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越来越普遍,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就像救火队员,哪里出问题就往哪里赶。进入新世纪,农业税费压力大。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文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此时的乡村治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科学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乡村治理凸显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自治和法治并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际上为乡村治理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于新时代,建立起党、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

理机制。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眼于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围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全面振兴乡村的目标和要求共同开展各项工作。

## 二、乡村治理的探索和实践

如何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引起了各地的足够重视。笔者在调研中看到,各地纷纷创新治理体制,改进治理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

### (一)党建引领自治,破解基层治理难点

很多村庄都构建了以村党支部为领导,以村委会为自治主体,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队伍共同参与的村民自我管理模式,形成了“事情共商、资源共享、问题共解、秩序共管”的治理工作格局。江西省分宜县杨桥镇庙上村是第七批“全国法治示范村(社区)”,该村把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把自治、法治、德治贯穿其中,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成立了由村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民主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将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村干部学法用法档案,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实行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依托“金牌调解队”,开展法治宣讲,提升村民法律意识。庙上村也从过去的“麻烦村”变成了如今的“和谐村”,这个村应该是全国以党建助推基层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

### (二)弘扬德孝文化,崇德向善聚人心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雷家坡村以弘扬德孝文化为着力点,不断创新手段,丰富载体,聚拢人心。2010年以来,该村以“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德孝大讲堂、农家书屋、基层文艺演出队伍、基层志愿者服务队伍和德孝文化墙”六位一体的德孝文化苑建设为平台,深入开展了“寻找最美盐湖家庭、雷家坡村夸媳妇比赛”“清明德孝礼”“树家风传家训活动之金榜题名感恩父母”等一系列德孝文化实践活动。全村先后涌现出盐湖区十大孝顺媳妇刘爱样,盐湖区“百佳孝顺媳妇”黄小改、张秀芳等一大批德政楷模。在全村党员和群众的心灵中播下了德孝的种子,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新民俗。在德孝文化的熏陶下,雷家坡村凝聚起了党员群众共建美丽乡村的磅礴力量,人人都是受益者,孝老爱亲志愿者服务队越来越壮大。

### (三)领头人物调解,随时处理基层问题

湖南省安化县城南区中砥村有个“谌小菊工作室”,这里是全村人最熟悉、被称作“村民事务110”的地方。从2013年设立起,谌小菊每年接待群众1200人次以上,从处理各种民生事项,到为村民提供技术帮助,再到法律咨询,最后化解各种矛盾纠纷,这里成为村民乐意去咨询并能及时得到反馈的地方。谌小菊也从一名计生专干成长为中砥村的村支



书。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村民有疑问,谌小菊都耐心给村民解疑。她的工作日记上记满了村民的各种诉求信息,还记着村民的手机号码,更记得村民何时需要援手。村民说:“小菊把全村人都装进心里,我们把她记在心中。”谌小菊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为村里谋发展,乡亲们看在眼里,也纷纷加入到乡村建设的队伍中来。

(四)再学枫桥经验,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初“四清运动”的产物。毛泽东对浙江诸暨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捕”“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做法,表现出兴趣,当即表态: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优秀典型,以人为本始终贯穿于枫桥经验治理实践中,这也是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依靠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在新时期,枫桥镇积极探索“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的矛盾解决模式,推动建立多方参与、多面分布的“大调解”格局。依靠群众建立“大调解”机制,建立新型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引入基层管理信息系统,不仅提高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还实现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把社会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

(五)加强网格管理,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浙江省在乡村治理上采用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模式,自2012年推广至今,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进行网格化管理,大大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率,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这里以平湖市的乡村网格划分为例进行分析。行政村以自然村落、农民新村、片组或党员先锋站覆盖区域等为划分单元,辖区内工业园区或企业较为集中、情况较为复杂的区域单独建立网格。网格按照“一格一员”“一格多员”“一员多格”的网格管理模式,网格员有专职也有兼职。在新埭镇姚浜村,4个网格的网格长由村干部担任,网格员由村民小组长担任。网格员承担信息采集和传递的任务,采集人口、房屋、场所、组织等基础信息以及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群众诉求等动态信息,依托“平安建设信息系统”的网络平台,及时录入。平湖市构建了市、镇、村三级事件处置网上网下一体联动工作体系,按照涉事性质和严重程度,对网格员上报的动态信息分为三个等级,交由村社区、镇街道和市逐级受理,紧跟着督察考评,确保上报的信息“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六)寻找治理根基,促进乡村社会和谐

乡村社会组织根植于民间,在协商集体事务、推进公益事业、组织志愿服务、传承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笔者在安徽省绩溪县尚村调研

时,发现了“积谷会”这一存在了近百年的社会组织,其发展为探索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早在1913年,为解决百姓口粮短缺问题,尚村村民会议成立了积谷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积谷会的粮仓是老百姓的救命粮仓。老百姓通过积谷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信任,互相帮助。2014年尚村恢复了积谷会,村民积极参与,积谷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好助手,积极发动村民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成为联结外界的桥梁,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人士关注村庄的发展;成为乡风文明的践行者,带领村民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像积谷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从群众中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凝聚农民的力量共谋发展过程中,一些内部矛盾都能够自然化解。

(七)培育社工组织,搭建村民交流平台

浙江省平湖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社工组织,探索以第三方介入的形式开展服务,推动村庄和谐发展,其创新性的做法和实践值得探索和推广。平湖市曹桥街道野马村在拆除违章猪棚时,老百姓对政府改善生态环境的初衷不理解,工作难以开展。为此,平湖市政府通过招标选择青鸟社工机构,购买社工服务,希望社工能在其中做一些工作。2016年5月,青鸟社工服务中心



正式入驻野马村。社工人员全职工作,同时广泛招募志愿者,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因地制宜地成立帮扶小组,关爱身边需要关心的人,陪他们聊天、晒太阳,完成一些小心愿,让困难村民感受到社工和其他群众的关怀之情。很多村民更愿意和社工交流,社工把村民的意见及时与村委会沟通,使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更加顺利。

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创新,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离不开各类社会组织的配合。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因素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乡村治理的探索也各不相同,还有一些地方的“村民说事”“民主恳谈会”等都在当地取得了明显成效。哪种乡村治理路径合适,还得实事求是,结合当地发展情况而定。

### 三、朝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为了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乡村治理指明方向,也提出了具体措施,各地正在落实过程中。

适逢2020年初应对新型冠状

肺炎疫情,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检验。为了让农民群众安全渡过疫期,各地出台了一些特殊措施和办法,有的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有的却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甚至冲突,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反思。事实证明,乡村治理的目标是正确的,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在党组织领导下,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走乡村善治之路。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基础,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领头羊。《意见》指出,首先,要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把优秀人才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个别可以吸收到村“两委”领导班子中来,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人坚决清理出村干部队伍。其次,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加强对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合作经济组织,还有其他一些群众性自治组织、新型经营主体等乡村治理主体的领导,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这些主体之间的治理边界,明确权责归属,理顺利益关系,努力在实践中形成平衡的治理结构和协同的互动关系。再次,要压实责任。采取多种形式,如网格化管理、党员户挂牌、设岗定责等,推动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带头示范,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

群众。

(二)完善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社会的主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资本。村民自治在体现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权益、激发农村活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通过引导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人有序参与农村发展事务,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理念共识,提升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以自治来消化矛盾。在乡村治理的具体事务上,应将政府的主导责任更多地体现在引导、鼓励、支持、服务等方面,确保广大农民能够运用适宜的平台、有效的渠道来表达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益,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

(三)提升法治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的迫切要求

以法治定分止争,这是乡村治理的迫切要求。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的要求、任务和实施要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必将推动乡村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提高乡村法治化水平,一要加强立法;二要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三要规范基层执法程序,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



权限执法,将各项涉农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

(四)提高德治水平是乡村治理的内在需要

以德治春风化雨,提升治理的质量需要提高德治水平,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扎根在农村,让伟大的中国梦深入人心。要加强不良习俗的整治,发扬传统美德,积极重构乡规民约和乡里制度,着力发掘乡风、家风、民风及乡史、村史、家史,用印迹乡村的形式推进村落共同记忆的回归,发挥文化对乡村治理的涵育和滋养功能。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推进文化治理。建立道德讲堂、文化主题公园、文化礼堂等阵地,为民众提供文化服务,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引导人们讲道德、守道德,通过文化传统引导民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开展“道

德模范”“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身边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形成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

(五)加大试点力度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成效

乡村治理的路径需要结合各地实际不断探索,要加大乡村治理的试点示范力度,扩大试点范围,巩固成效。一方面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并扩大试点范围,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國经验。《意见》下发以后,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作为首批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党

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完善基层治理方式、村级权力监管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现代乡村治理手段。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要加强经验总结,对好的经验模式要尽快推广。

(六)鼓励多组织参与是乡村治理活力所在

农村存在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如妇女组织、老年人协会、专业合作社、红白理事会、志愿者服务组织等,有些是依赖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有些则是利用现代市场和趣缘关系形成的,它们都是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乡村社会组织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这些组织有较强的自治能力。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

上参与到各类社会组织中,通过公益创投、委托、购买服务、设立专项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方式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向村民提供他们最关切最急需的服务项目,实现基层管理服务与村民需求的无缝对接,形成基层服务的合力。

(作者: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做好“干部直播带货”后半篇文章

文/林立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直播带货成为打通各地农产品销路的重要途径,也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决战脱贫攻坚的应对措施。不少领导干部变身“网红”主播,不遗余力直播助销,得到各方纷纷点赞。但“干部直播带货”解决的是当前农产品销路问题,若能以此为切口,建立电商直播长效机制,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 一、线上消费新业态呈现强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4月20日在陕西省金米村村民的直播平台前指出,“电商在农副产品的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大有可为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北京的基层干部,笔者在疫情期间参与了3场不同的直播带货活动,感受到了这种线上消费新业态呈现出的强大优势。

一是带动产品销量。以北庄镇为例,位于密云水库上游,生态绿



色农产品丰富,受疫情影响,往日供不应求的鲜活农产品产生了滞销。镇政府借势疫情“宅经济”和市民对“菜篮子”的品质需求,组建团队直播推销,把首都水源地的农业优势从“地上经济”迅速转变为“线上经济”,农业收入实现逆势增长。

二是提升当地流量。北庄镇邀请优酷视频直播专业团队,量身定制一档《醉美乡游记》的线上推广栏目,在为农产品“带货”的同时,全面介绍了北庄的生态环境、文化底蕴,强力推介当地旅游资源。据统计,2小时直播,直播间访问量58万人次,给当地带来了十足的流量和人气,直播后的五一游客的

暴增和民宿的火爆以及央视的报道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是促进作风转变。“干部直播带货”既是以互联网思维解决燃眉之急的创新之举,也是政府机构转变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要想直播带货效果好,领导干部要多沾“烟火气”,多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走一走,熟知本地农产品优势特点;还要多些“肝胆气”,敢于触网懂网,掌握直播带货规律和熟悉“网言网语”。在屏幕外下足一番功夫,直播带货才能有底气,为民服务才能得人气。

四是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直播带货是当地接入新经济发展的机



会窗口,给当地在疫情期间抢抓机遇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就要求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强化农产品品牌意识,提高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让直播带货后劲更足。

## 二、直播带货特点及问题

直播带货是领导干部主动担当、情系于民,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要求的体现。参与多场线上直播带货后,笔者的直观感受有三:

一是新鲜。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直播带货是跟上“网络强国”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推动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是一次全面提升。对于网友来说,这种线上互动形式“亲切感”“新鲜感”十足,直播干部一改往日严肃形象,卖力热情地推销农产品,拉近了干群关系。

二是真诚。地方干部走进直播间,不管现场试吃推介,还是展示才艺吸引流量,目的就是解农产品滞销之困,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消费者之所以愿意为干部直播推销的农产品“买单”,除了满足自身的实际需求外,更多的是对领导干部身份的信任,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可和肯定。

三是民生为本。“干部直播带货”是走好互联网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下“架子”、做好“样子”,切忌形式主义、夸大其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农产品代言,以接地气的方式为群众服务。

在直播带货火爆背后,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产品质量难保障。直播带货多为时令农产品,面对井喷式增长,部分农业企业在存储、包装、物流等环节处理不到位,导致“鲜活”品质下降,引得消费者不满。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就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

二是政府公信力易损害。“干部直播带货”是以个人信誉乃至政府信用给当地产品背书,为其贴上了“信用标签”,一旦农产品质量不够“硬核”、售后服务跟不上,损失的不仅是产品口碑,更是对干部个人乃至政府公信力的损害。

三是缺乏行业规范制度。当前,直播平台缺乏明确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个别领导干部为了“政绩作秀”或因私利随意带货直播,对政府作风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 三、建机制让农民搭上直播带货快车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又面临疫情防控的严峻考验,领导干部主动担任“最强推销员”来化解农产品滞销之困,但其综合效应显然不应止于“带货”,如何构建长效机制,让更多农民搭上直播带货快车,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实实在在收益尤其重要。

一是直播带货行业需规范准入机制。要加快出台干部直播行业相关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明确要对直播销售农产品

进行质量评估,细化商家售后服务标准,避免出现“翻车”事故。规范干部直播准入标准,原则上只能在出现自然灾害、疫情等不可抗力的重大事故影响下直播销售,且需事前向组织报备。要加大对直播平台审查监管力度,完善“网红带货”诚信评价机制,对农产品筛选不严、夸大和虚假宣传的,列入黑名单,净化直播行业空间。

二是直播带货行业需注重人才培养。“干部直播带货”系应急之举而非长效之策,不能因直播带货而耽误主责主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带“货”更要带“人”,要培育爱农业、懂技术、知村情的农村直播“网红”队伍,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着重从本土年轻人、毕业大学生、退役军人中选拔,提供网络直播技能培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将直播带货做得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

三是直播带货行业需构建农产品全产业链。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依托5G、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手段,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要落实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创新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加大电商与农户、农企等产销对接,拓展农产品加工、包装、仓储等设施建设,加大与冷链物流企业合作,促进优质农产品卖出优价,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切实提升政府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作者:密云区北庄镇党委书记、镇长)



## 从故宫营造看休闲农业提档升级

文/赵晨

故宫从古时的封建中央政权统治居所到如今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院，已成为国家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展现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底蕴，是探索、研究、学习的知识宝库。休闲农业是民生产业和新型消费业态，近几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经营效果呈现出两极分化，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的休闲农业项目层出不穷，传统的仅有涉农项目的休闲农业园经营困难，缺的是“文化”。故宫从对人民开放至今，一直是外地甚至外国人到北京旅游的必去打卡地，如何能让京郊的休闲农业园成为北京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就从故宫这个鼻祖级打卡地学上一二。

### 一、“文化”之规划先行

#### (一)重点突出

在封建统治时期，故宫作为统治者的居住地，选址在北京城正中，“众星拱月”彰显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与不可侵犯，皇后的寝宫乾清宫和坤宁宫、皇后接受后宫朝拜的交泰殿、皇帝祈福的钦安殿位于故宫中轴线上，这四个主要建筑庄严肃穆本身就是视觉中心和景观焦点，起到举足轻重的统领作用，处处体现皇权至上，从规划设计角度看，重点突出是吸睛要点，放在休闲农业园规划设计中，重点建筑一定是经营重点的体现。

京郊休闲农业园大部分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情况，重点不突出，园内餐饮、住宿、游乐一应俱全，但品质不高，没有特色，游人入园没有游览重点，很难给游人留下深刻印象。

休闲农业园中也有重点突出的案例，朝阳区蓝调庄园是一家以薰衣草为主题、婚庆为主要经营项目的休闲农业园，遍布薰衣草的庄园中分布着教堂、车站等婚庆建筑，让游人对园区印象深刻。

借鉴故宫“重点突出”，可以将休闲农业园的特色向游人第一时间展现，或引导游人看到园区的特色，如亲子教育园区将亲子互动场所放在园区重要的位置，科普教育型园区将科普内容放置在园区重点位置等。

#### (二)合理布局

以乾隆为自己退休养憩而建造的乾隆花园为例，这座花园建造在南北长 160 余米，东西宽尚不到 40 米的狭长范围内，通过山石树木、亭台楼榭合理设计，呈现



出一个生动的融合了江南风情的花园。

乾隆花园的布局合理体现在将建筑物加高等实现遮挡视线或吸引视线,增加园中的景色观赏性和层次感;其布局合理体现在观赏线路安排得当,提高了乾隆花园的艺术效果,如进入花园正门,绕过玲珑剔透的山屏,是一条用五颜六色的石片铺漫成冰裂图案的小路,将游人引入幽静的小院,给游人创造了含蓄而灵活的意境,此手法意为“曲径通幽”。

休闲农业园可谓是“农业主题的花园”,它应该有一定的可观赏性,但大部分休闲农业园的可观赏性较差,没有景观设计,部分有景观的园区,如延庆区涵碧泉,是以花卉种植为主的园区,进入大门后就可以看到一马平川的花卉景色,让人一眼望遍,游人缺少探寻景色的兴趣,减少了游人在园区内的停留时间。

借鉴故宫的“合理布局,增添美感”,利用造景增加休闲农业园的可观赏性,可以设计花墙、绿植迷宫等,增加游人的游园时间,更是增加游人消费的重要手段。

### (三)巧妙设计

故宫的规划设计中,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其精妙的排水系统。每逢大雨之时,太和殿的高大石基上都会出现“九龙吐水”的壮观景象,雨水从九个龙口喷出,顺势流向沟渠,最后通过下水道排到内外金水河,最后汇入宫墙外的护城河。

借鉴故宫的“巧妙设计”,将美观实用的设计理念应用到休闲

农业园的设计之中。如,延庆区妫州牡丹园内的牡丹品种的展示牌原本只是塑料牌子,缺乏美观效果,后改成整块石刻,提升了美观效果还有实用价值。再如有的休闲农业园将不同颜色的塑料瓶拼成图案,用作遮阳棚,在阳光下呈现不同色彩。

## 二、“文化”之美学营造

走进故宫,映入眼帘的是,碧蓝的天空下一大片金黄色的琉璃瓦顶闪闪发光;屋檐下的青绿色调的各种装饰彩画绚丽多姿;红色的立柱与精心雕琢的红色镶金镂空门窗组成了宫殿的部分屋身,白色的汉白玉台基与深灰色地砖,这些红绿黄蓝白灰等色彩对比强烈,使故宫宫殿显得金碧辉煌又雍容华贵,色彩浓重又端庄和谐。故宫将色彩之美运用纯熟。

休闲农业园亦可以借鉴故宫的“美学营造”,不仅可以运用色彩美学将园中绿植、花卉、蔬菜进行色彩的巧妙搭配,增加园中景色的可观赏性,用图画将园区水泥建筑遮盖,用月季墙、小竹林等丰富视觉空间等。

## 三、“文化”之内涵挖掘

故宫的建筑体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德”与“礼”。“德”即内心修养,体现于故宫中每个四合院式的庭院形制中,每组庭院由一排正房和两排厢房合成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人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院子里,中国人含蓄内省的性格可见一斑。“礼”即行为规范,体现于故

宫中建筑的殿式、屋顶样式、面阔、建筑用料等,都有等级标准,逾越者可招致杀身之祸。

台湾的大湖草莓园、青葱文化馆等,尽力将农产品的文化内涵挖掘极致,而北京的休闲农业园总是因为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刻而被行业专家诟病,很多休闲农业园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特色不突出,主要是因为文化挖掘不深入。借鉴故宫的“内涵挖掘”,是京郊休闲农业园提升品质的关键。

如,延庆区华海田园是以天文为主题的休闲农业园,园中有很多天文观测设备,近几年也建设了天文科普教室和球幕影厅,但是农业与天文的结合不深,没有充分挖掘天文主题内涵,在古代,中国农耕时节跟天文观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挖掘科普知识和互动体验活动等。

现在故宫的文创产品是将故宫的文化进行拓展与丰富,增加农产品衍生品也是休闲农业园可以学习与借鉴的。

故宫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创意。北京的休闲农业也是北京农业的传承与展现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传承农耕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作用。如何提升“文化”,增加内涵,将北京特色的农业历史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才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



# 通州区“雪亮工程”提升副中心 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文/张德启



近年来，通州区始终坚持把“雪亮工程”建设应用作为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雪亮工程”自2018年6月投入运行以来，在治安防控、科学决策、社会治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在查找控制涉疫重点人、查控人流车流等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关键作用。但是，通州区与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较高的杭州、深圳、上海等城市相比，信息化基础建设仍然较为薄弱，“雪亮工程”深度应用亟须

提档升级。

今年3月下旬，通州区委政法委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对全区“雪亮工程”建设应用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提出进一步深化拓展“雪亮工程”建设应用、提升副中心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意见和建议，力求在区级层面打通信息壁垒、依托“雪亮工程”构建全区一体化“共享平台”，推动设施连通、信息互通、工作联动，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高水平的“平安通州”打下坚实基础。

## 一、“雪亮工程”建设情况

2016年，通州区入选全国首批45个“雪亮工程”建设示范城市，同年9月由区发改委批复立项，立项资金10.8亿元。2017年10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018年6月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雪亮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前端设备、后端平台和应用系统“三大部分”。前端设备主要是覆盖通州全域的高清视频监控摄像机及其配套设施，包括网络云台、车辆卡口、人脸识别、Wi-Fi采集、超高清等



各类智能图像信息采集的监控设备共 1.6 万台;后端平台主要是机房、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系统硬件设施,项目建设和警务中心机房,租赁了 IDC 专业机房,扩展改造 24 个派出所节点机房,建设了存储能力达 50PB、计算能力达 5000 核的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应用系统主要依托采集的各类数据建设的 GIS 地图、车辆、人脸、Wi-Fi 以及图侦等五大公安应用系统和综治应用系统。此外,针对通州区城市治理的智能应用需求,开发了环保监测、环卫监测、渣土车管控、公车管理等应用模块。

## 二、“雪亮工程”应用情况

(一)着眼实战应用,助力平安建设

着眼于提升实战应用和重大安保工作效能,在治安打击和安保维稳工作中实现了“两个持续提升”。一是持续提升治安打击效能。依托“雪亮工程”视频智能化应用平台,构建“视频大数据智能化技战法矩阵”,积累技战法 70 余个,围绕实战需求,提供各类数据检索、研判分析等精准服务。2019 年,通州区公安分局视频打现率、协破率达到 40%,累计协助破案 1047 起,抓获嫌疑人 1863 人。二是持续提升安保维稳水平。基于车辆、人像、Wi-Fi 等实时采集的海量数据,搭建研判布控模型,将各类重点关注人员纳入监测,管控高危人员、预警异常行为、消除风险隐患,2019 年重大安保期间系统有效预警 36000 人次,下发核查预

警信息 4500 余条。

(二)聚力数据赋能,助力智慧治理

着眼于加快副中心智慧城市建设,探索研发了智慧交通、智慧司法、智慧环保等十余类“智慧+”应用。一是服务“智慧交通”。建立了套牌车数据模型,累计抓获各类套牌车 37 辆;通过视频智能化数据分析,主动发现黑车黑摩的线索 403 辆,辅助整治重点乱点区域 20 余处;转递闯红灯、遮挡号牌等违法违规线索 200 余起。二是服务“智慧环保”。开发环保监测系统,将全区 650 个环保监测点与视频监控图像进行关联,实现了对污染源监测点位的可视化巡查、污染证据固定,环境污染事件发现处置效率提升了 60%。三是服务“智慧城管”。针对游商小贩、占道经营等问题,依托覆盖全区的视频监控,实现了自动分析预警。2019 年,仅梨园地区即成功处置 150 余起各类问题。四是服务“智慧监委”。为区纪委监委开发了公车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公车私用违纪问题的智能化预警,成功辅助区纪委监委移送问题信息 900 余条,有效杜绝了通州区政府机关公车私用违纪问题。

(三)实现科技战“疫”,助力疫情防控

依托“雪亮工程”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实现人员管控、密接分析、复工研判“三个精准支撑”。一是精准支撑人员管控。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核查在通人员 10 万余人,推送“六类人员”动态、及时发现并通

报异常活动人员 220 余人次;分析各类数据信息 30 余万条,每日发现各类返通人员 1000 余人,动态掌握境外返通仍在隔离期人员 800 余人。二是精准支撑密接分析。基于实时位置和同联网特色数据,构建了同网、同行、同车、同屋、同工“五同密接发现模型”,全力支持密接人员分析工作。三是精准支撑复工研判。综合运用数据比对、碰撞、分析,精准预测“原职住在通、节后滞留鄂”群体 4000 余人返通趋势,逐一核定准确率达 90%;建立“警企复产联查”机制,助力相关重大工程复工,共协助核查复工人员 50 批次 32494 人。

##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调研情况看,目前,通州区“雪亮工程”多维度、深应用还未能落实落地,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传输网络、视频信息共享平台、安全管理系统还不完善,点位互补、网络互联、平台互通、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的联网共享、城乡监控一体化发展目标还未实现,数据壁垒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

(一)系统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安全设备亟须加固

一是前端功能较弱。调研中了解到,“雪亮工程”前端功能不能满足各部门的需求。如,城管执法与雪亮共享,主要是视频巡控乱倒渣土行为,区城管执法局可以通过公安探头的公安视角进行监控,但不具备调整监控方位等功能,因此需要提升雪亮溯源系统功能;区教委



与雪亮对接目前状况是只出不入,即只能为“雪亮工程”提供信号资源,而不能接收到“雪亮工程”的信号资源,无法使用雪亮平台;区生态环境局在使用中发现,目前“雪亮工程”缺乏自动识别功能,导致监控时发现问题,只能通过人工截图的方式进行查看,遇到突发问题不能及时保留相关图片。二是存在“两个不足”。建设方面存在移动布控设备和视频监控森林覆盖率“两个不足”。移动布控设备不足主要体现在行政办公区内监控覆盖上,由于行政办公区内无法建设固定监控设备,造成办公区内出现一定监控盲区;森林覆盖率的不足主要是在森林、绿化带区域的覆盖不足,此类区域存在树木对监控的遮挡问题,视频监控的可视范围受到限制。三是系统前端点位布设未能实现合理化。调研中发现,有的区域前端点位重复,有的重点区域出现盲区。如,校园周边目前“雪亮工程”监控还没有实现全覆盖,经排查,目前有77个教学点周边没有雪亮视频监控设备。四是系统安全设备亟须加固。“雪亮工程”投入使用以来,在方便部门业务应用的同时,也产生了网络安全隐患。产生网络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雪亮工程”逐步扩大的应用需求增加了视频网络节点,系统目前的安全等级为等保二级,现有的安全设备及策略已无法满足要求,亟须对系统安全设备进行加固。

(二)发展不平衡,信息化应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雪亮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公

安机关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技术,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治安防控、安全监管、防范重大风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系统功能不强、专业力量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及数据安全性保护等技术问题亟待解决等诸多原因,各部门、各街乡镇在“雪亮工程”应用方面存在不足。通州区“雪亮工程”资源基于公安视频专网建设,安全等级保护级别高,与各单位安全等级较低自建系统不能完全对接,造成雪亮系统相对封闭,已接入雪亮的单位无法利用自建系统解析雪亮视频资源、获得本系统所需要的信息要素,这也是导致地方信息化应用存在短板和不足的原因之一。

(三)“数据壁垒”需要破题,视频图像资源需要进一步统筹

一是“雪亮工程”统筹存在壁垒。联网共享作为“雪亮工程”一项重点任务,虽然目前全区已联网2万多路,整合了57家单位的视频资源,但仍有部分区属委办局视频图像未实现联网,已联网的、有自建监控系统的部门和镇因专网安全等级保护的原因未能与雪亮连接,未形成全区“一盘棋”格局。如,马驹桥镇结合自身实际,构建了4G专网,形成覆盖全镇、多网合一、可视管理、自动报警、统一指挥的“网格+网络”体系,但由于“雪亮工程”视频专网安全等级保护级别高,故该镇系统平台未能与之连接。二是对外整合存在壁垒。目前,确有必要联网接入的三类视频监

控点即社会视频资源还未整合,社会视频资源整合接入缺乏系统解决方案,区级层面亟须做好分级分类按需接入的系统总体设计。

(四)基层管理体制不畅、系统运用效能较低

全区17个街乡镇,已有16个街乡镇联网共享了“雪亮工程”视频系统(通运街道目前还未铺设视频专网),但调研发现,目前仅有8个街乡镇利用“雪亮工程”开展日常监控巡查工作,另外8个街镇“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系统处于闲置状态。基层体制机制不顺畅、系统所属和维护部门不统一、没有形成主管领导亲自盯应用、主责科室主动应用的工作格局。据统计,16个街乡镇“雪亮工程”分属综治办、网格办、城管办、社会办4个部门管理,其中,管理部门属综治办,系统设备安装在网格办的共计8个单位,占总数的50%。

(五)运维短板亟需补齐,专业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一是自建系统缺少定期维护。“雪亮工程”整合了部分单位视频资源,一些被联网单位自建设备老旧或缺少定期维护、设备损坏率高,导致接入雪亮的视频资源在线率不高。二是专业队伍力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目前,区级层面、区属委办局、街乡镇普遍存在视频专业力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的问题。调研中发现,有些单位资源闲置,没有投入使用,因为不知道怎么用,雪亮系统成为“摆设”;有的虽然开始利用,但只知道看视频,不知道如何深度应用;还有一



些单位基本没有专业力量,甚至没有专人负责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这也是导致雪亮系统未能深度应用的原因之一。

#### 四、深化拓展“雪亮工程”建设应用,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其中,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契合当今时代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实际,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力抓手。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深化拓展“雪亮工程”建设应用,推动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优化流程,提升效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通州”。

(一)推动“雪亮工程”二期建设,着力提升副中心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极大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关联形态。我们必须树立社会治理智能化理念,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雪亮工程”二期建设,确保“雪亮工程”提档升级。一

是扎实做好需求统筹。区委政法委要会同区公安分局,利用一个月时间,全面梳理“雪亮工程”建设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各部门、各街乡镇应用方面的需求,为完善雪亮二期建设方案提供依据。二是优化二期建设方案。针对存在的不足和各部门、各街乡镇需求,修改完善雪亮二期建设方案,细化前端补点、前端功能提升、共享平台视频资源整合扩容、行政办公区智能管控平台和安全体系加固等重点建设内容,尽快启动二期项目建设。三是拓宽运用领域。主动服务社会治理,探索视频图像信息在生态建设与保护、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应用,确保应用效能最大化。四是挖掘运用功能。按照“精准打击、精确治理、精密防控”原则,依托大数据技术,强化对海量信息的关联分析、碰撞比对,增强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切实提升副中心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二)树立“一盘棋”理念,构建与副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城市大脑”

树立一个大局、一张蓝图、一盘棋思想,借鉴杭州、深圳、上海等先进地区智能化建设经验,汇集全区各类数据资源,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纵向串联区、街乡镇、社区村综治平台,横向整合相关职能部门视频资源和自建监控系统,因地制宜构建副中心智能化支撑体系,建设与副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城市大脑”,实现视频专网与社会视频资源深度整合、互联互通、无缝链

接、“一网通管”、“一网通办”。一是坚持顶层设计。领导者、决策者驾驭,使用和应用顶层设计是重要的领导工作的实现方式之一。区委区政府要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主管领导具体负责、区经信局总体牵动、各相关委办局主要领导参加的副中心“城市大脑”建设领导机构及办公室,做好顶层设计、政策制定、组织谋划等工作。尽快出台副中心一体化共享平台即“城市大脑”建设工作意见和相关配套方案,建立健全评价体系,明确工作原则、工作目标、总体框架和实施架构。要突出重大战略落地、问题导向、特色品牌、智能中枢及支撑体系项目建设。二是坚持高标准打造。依托“雪亮工程”建设,集成创新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将公安专网平台即雪亮“公安大脑”升级为“城市大脑”,分别构建“两个平台”即公安专网平台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共享平台,将“雪亮工程”项目中涉密部分分离出来,单独建立一个平台,从维护稳定、社会治安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积极拓展,打通公安、住建、交通、应急管理、水务等部门的信息系统,推进公安、行业、社会“三类视频”能接尽接、汇聚共享,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设计,探索构建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的副中心“城市大脑”,实时掌握全区宏观态势并开展大数据分析,实现对城市运行的超强感知、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异常情形的及时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三是坚持实体化运



行。通过“城市大脑”统筹管理全区视频图像信息等应用系统,落实机构建立、人员编制等事项,制定工作规范,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能,形成全区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建设、联网、管理、应用工作标准,确保实现全区共享共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岗前培训、定期培训、专业培训等运维长效机制,完善会商研判、分流指派、协调联动、督办评估等实战化运行机制,扎实推进“城市大脑”实体化运行。

### (三)加强统筹协调,扎实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

要按照市平安办《全面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统筹协调,分步实施,利用两年时间实现副中心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全覆盖。一是明确思路目标。按照“先中心后周边,先重点后难点”的建设思路,分层次、分区域逐步推进“智安小区”建设,今年要建设完成 266 个,并严格建设标准,为接入区级平台做好准备。二是界定重点区域。将中仓、通运等 6 个街道和梨园、永顺 2 个镇作为重点建设区域(该区域内共有 527 个小区),以有物业公司且小区规模大于 180 户的小区为主,全力完成 266 个智慧小区建设任务。三是“政府购买服务”。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模式可考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由中标企业负责硬件设备的购买、更新、软件研发、小区平台运维保障等全套服务,政府每年按照考评绩效向企业支付服务费,设备所有权归企业所有。四是健全推进机制。要建立联席会机制,定

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通报建设进度,解决难点问题;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根据两年全覆盖任务和阶段性安排,强化常态督导,并纳入执法质量考核。

### (四)理顺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探索“网格化+智慧化”社会治理新模式

目前,社会治理正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充分借助智能互联技术,将辖区“一乡十镇六街道”合理规划基础网格,将全区布设的智慧探头与网格员相整合,有效破解基层普遍存在的“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难题。一是理顺管理体制。要构建街乡镇一名主管领导盯应用、一个科室负责的应用工作格局,有效解决权责不清、运维管理不到位问题,着力提升基层智能化效能。二是加强“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各街乡镇要以社区为单元,以网格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支撑,建立精准到户、纵横连接的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要将“雪亮工程”、综治信息化平台、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等公共安全监控资源融合对接,加强“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应用根基。三是建立“四级管理”责任体系。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构建以区级“城市大脑”为中枢,区、街道(乡镇)“两级指挥”和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基础网格“四级管理”为骨架的社会治理架构和责任体系。四是构建闭环处置机制。打造城乡统筹、网上网下融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一体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

以智能化为支撑,实现对社会治理基础要素的立体防控。将每个网格员手机里安装“综管通”App,作为散落在每个网格里的“移动探头”,把“人、地、事、物、组织”联网,随时把发现的问题通过 App 反馈给综治管理平台,构建“问题反映、后台交办、进度查询、办结反馈”闭环处置机制。

### (五)突出示范引领,加快推进“智慧园区”试点建设

以运河商务区为“智慧园区”建设试点,坚持高点谋划、高标准设计,拉高工作标杆,突出示范引领。一是高起点规划设计。构建“1 平台、4 板块、17 应用”智能化管理应用体系,即通过 17 个场景化应用服务,组成智慧决策、智慧信息基础、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等 4 大板块,在此基础上形成 1 个智慧园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与此同时,“智慧园区”总体设计要考虑园区设施与“雪亮工程”连接,与经信、公安部门有效沟通。二是分阶段推进实施。2020 至 2022 年,利用三年时间分阶段推进“智慧园区”试点建设。建立智慧园区框架体系,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深化和拓展项目管理、产业促进及管理决策等方面建设,逐步完善各应用场景,实现 4 大板块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有效提升服务水平与管理效率,着力打造一流“智慧园区”,为整体推动副中心“智慧园区”建设提供借鉴。

(作者:通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 副中心美丽乡村铺展新画卷

文/宋庠儒 陈 萌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铸就美丽梦想家园——今年,通州 360 个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启动,一幅幅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展,让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副中心一张靓丽金名片,群众幸福感倍增。

副中心作为“四线两区”重点区域之一,全域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范围。自 2018 年开始,通州重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村庄规划编制,圆满完成了阶段任务。2019 年,聚焦重点环境问题,拆除村内违法建设,全力消除环境痼疾。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近两年,全区上下紧抓副中心建设机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第一场“战役”,全面推进 360 个平房村庄整治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一颗初心回报群众信任、以实际行动回应百姓关切,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用绿色环境造福子孙后代。”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多年影响农村环境的顽疾实现了彻底治理,农村几十年来累积形成的脏乱差面貌得到极大改观。通过

拆除村内违法建设,不仅拆出了好环境,也“拆”出了公心、民心、信心、暖心、期待心,“拆”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更“拆”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政策的拥护。这也为全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开展基层民主治理进行了路径探索。

疫情防控期间,通州严格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治乡村、保障人居、阻击疫情、强化宣传,确保疫情防控和环境整治“双推动、双见效”。另外,推动村庄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持续化。“我们要求各乡镇、各村庄务必做到三个严格:严格落实公厕保洁和消毒措施,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和消毒措施,严格落实返京人员管控隔离措施。”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做好村内环境清洁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动员村民,开展庭院清洁行动,自觉清扫整理个人庭院,从里到外扮靓家园。

今年是中央、市级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及村庄清洁行动收官之年。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通州将以防疫为切入点,立足清、聚焦保、着力改、促进美,全面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深化整治,营造促进健康良好氛围。

### 建设美丽乡村——疏解整治促提升形成“副中心经验”

城市副中心是北京重要一翼。规划建设副中心,其中就要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北京城市功能。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加快推进拆除违法建设相关工作,为副中心腾出空间。

2019 年初,全区全面启动村内违建专项拆除行动,聚焦村庄环境顽疾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全区 360 个平房村庄拆除违建近 5 万处 330 余万平方米,拆除数量和效率在全市位于前列。“我们在拆违工作中,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政策导向、敢于攻坚克难、动员基层力量,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副中心经验’。”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区将深入推进村内拆违工作,尽快完成村内燃气管线改移,加快涉“气”违建拆除,在此基础上,平稳完成其他应拆未拆违建的扫尾拆除。



## 全覆盖无死角——打造清新明亮空间

在近两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全区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全员出击,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一次全覆盖无死角的整治行动。

小厕所、大民生,解决好百姓身边事。通州区坚持“先试点、后推广”原则,建设了公厕样板间,保证公厕建设成本可控、高性价比、设计简洁、功能实用、节能环保。去年,360个村庄已全部启动公厕建设,年度市级公厕改造提升任务全部完成;户厕改造,坚持“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原则,对成本、定位均比较适合通州区的几种改厕模式进行试点示范。去年,全区卫生户厕覆盖率已达到99%,提前完成2020年任务指标。“今年,我们将全面启动‘751’范围内785座公厕的改造任务,优先完成48个城乡结合部村庄内公厕的新建及改造任务。统筹推进村内污水管线改造村庄的户厕更新工作,并做好与污水处理工作的衔接。”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清垃圾、做分类,培养卫生新习惯。治理中,在全区范围内消除农村垃圾非正规堆放点、露天垃圾“地搓站”等多类垃圾环境顽疾,同步完善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陆续建设垃圾、粪便、餐厨“三位一体”综合消纳处理站,同时“全方位武装”收集转运设备设施。建成投入使用后,农村地区环卫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面貌将得到彻底改善。去年,“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

乡分类转运”农村垃圾分类模式已逐渐在农村地区进行推广,为农村环境水平提档升级打了一针“强心剂”。今年,通州将推进全区城乡环卫体系建设,启动各乡镇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生活污物一体化综合处理站建设工作,进一步探索农村各类垃圾污物的高效处理利用。

## 推进“三清一改”——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可喜的是,通州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有力、成效突出、群众满意,在全国各区县中脱颖而出,荣获2019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2019年以来,通州区上下联动攻坚、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整合力量,将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建设城市副中心美丽宜居乡村的第一场“战役”,通过扎实推进“三清一改”工作,助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更上一层楼。

在村庄清洁行动中,通州以生活垃圾、河渠塘沟、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为主攻点。沿河截污、村外截污递次推进,清除区域内全部河流的沟塘漂浮物,消除50余条黑臭水体,解决近300个村庄的污水治理问题,消灭百余处小微水体污染点位。并分批实施重点区域村庄污水治理工程,生活污水处理及利用能力大幅提升,使得“污水不入河、污水不出村”的阶段治理目标初步实现。“今年,我们将完成41个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应改尽改,完成全区村庄饮用水水质提升工作。”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通

州区农村几十年来累积形成的脏乱差面貌得到极大改观。今年,通州将以此为契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全面开花和重点建设统筹推进,串点成线、以线带面,力争让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副中心的一张靓丽名片。

## 创建“美丽庭院”——促进千家万户院内院外干净整洁

环境卫生清洁美、摆放有序整齐美、种树栽花绿化美、庭院创意协调美、家风家训和谐美。去年年底,通州开展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力求做到“主街小巷、院内院外、天上地下”统筹考虑、同步实施。

创建活动中,全区360个平房村庄群众对照美丽庭院评选标准,踊跃参加活动。共有超1000户群众上传了自家庭院美景。通过创建“美丽庭院”,提升农民居住环境质量和精神文明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在全区评选出一批美丽庭院示范户,通过示范户带动,各村各家各户做到村内村外、院内院外干净整洁,持续保持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通州将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群众参与度,实现庭院干净、整洁、美丽,干干净净迎小康。

(作者单位: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 党支部把门 信息化防疫

文/杨冬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精神,朝阳区黑庄户乡以《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为行动指南,以“切断传染源”为根本目的,把支部建在门岗,运用信息化科技手段,高度统领协同作战指挥,夯实战斗堡垒,将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 一、“成立门岗党支部”严把“两道门”

第一道门:黑庄户乡共有小区

(村)38个,每个小区(村)开放一个大门,设有38个岗亭。为提升岗亭值守人员战斗力,黑庄户乡党委在每个岗亭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设书记、亭长各一名。社区(村)书记或机关科长担任书记,社区(村)“两委”成员担任亭长,统筹社区(村)干部、保安、志愿者等多方力量,24小时轮岗值守。每日分6个执勤班次,岗位人员全部实名上墙,执行交接班制度。门岗主要负责验证进出和测量体温。无论出入均须出示“双证”(出入证和身份

证)。社区(村)内无出入证的未隔离期人员,不得出户门,更不能出社区(村)大门。新返京人员由门岗负责引导至办证岗,完成相关询问和签字确认后,工作人员或房东负责护送至居所(避免随处乱走),14天解除隔离观察后方可取得出入证进出。

第二道门:在把好小区(村)大门的同时,为守住居家隔离人员家门,社区(村)与房东签订《房东承诺书》,压实房东对居家隔离人员的监督与服务责任。在户门外安装



无线高清监控摄像头,进行技防,一旦监控画面较上一帧有变化,系统将直接给管理人员手机发送预警。除做好居家隔离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外,社区(村)指派专人每日与隔离人员进行一次微信视频聊天,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 二、“信息化科技手段”成为一线作战有力武器

一套系统。为精准掌握辖区人员疫情防控信息,黑庄户乡与科技公司合作,连夜开发“黑庄户地区人口管理系统”,三天内上线试用,并随着工作推进不断完善。该系统具有信息录入、导出、统计分析,以及出入证打印等功能,涵盖人员基本信息、照片、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居住形式、来(返)京日期、出发地(精确到市)、同行者、交通方式(包括车次、航班号、车牌号)等信息。统计分析功能可根据需要实时统计分析并导出数据,无须基层反复填表,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一张表。支撑这套系统是一张纸质版临时出入证申请表,由申请人自行填写并签字确认。申请表囊括系统需要的所有信息。该表格是系统信息的主要来源,更是责任落实的重要依据。一旦存在因谎报瞒报导致的责任事故,该表格将作为追责的重要证据。

一份笔录。实践中发现,即便申请表签字确认,依然存在谎报瞒报行为。为最大限度提高信息准确度,针对节后返京人员,获取信息采取问询方式,即由两名工作人员

(一名询问人、一名记录人)与返京人员面对面沟通、一问一答的方式,最终形成被访人、讯问人、记录人三方签字的健康询问笔录,有效降低了谎报瞒报概率。

一张证。出入证是进出黑庄户乡的重要凭证,无证在社区(村)和企业寸步难行。出入证无须手工制作,由系统自动生成并打印,分为A、B、D三类,每类颜色各不相同。符合“14天内没有去过疫情高发区、没有疫情高发区接触史,且没有发热症状”或“满14天隔离期且没有发热症状”两个条件之一即可办理。A证面向居住或租住在社区(村)人员;B证面向企业员工;D证专门针对办公地点在社区(村)内的企业员工。出入证设计简洁大方,便于携带。证面上有类型标识、姓名、照片和17位编码,实行“一人一码”,汇集人员身份、居住地(社区、村、小区、楼号、单元号、门牌号)、工作单位、出租房屋等多项信息。

## 三、“高度统领协同作战”形成防控阻击强大合力

一是思路标准统得住。无论社区(村)还是企业,全乡疫情防控一个思路、一个标准。为实现统一,乡党委为社区(村)和企业分别制定了防控方案,并形成全套可操作的文字材料,可直接拿来使用。

二是辖区单位统得住。为实现全乡一盘棋,成立由“平安建设办公室”牵头的企业管控组,与国有、市属、私营企业主动对接,就“统一

思想、步调一致,统一标准、规范流程”达成共识。

三是作战人员统得住。统筹各类人员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形成联防联控联控工作局面。在乡、社区(村)两级人员安排上,发挥社区(村)工作人员人熟的优势,安排在门岗等直面群众的一线岗位;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工作则由业务精湛、细致严谨的机关干部承担,完成系统开发、表格制定、信息录入和证件制作等工作。基层干部前方作战,机关干部后方支援,各取所长、各司其责,减轻基层压力。

四是宣传口径统得住。总指挥部下设“宣传及舆情组”,根据上级精神和实际需要统一编撰和印制宣传材料,各单位无须自行制作宣传品和对外发布信息。北京市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后,宣传及舆情组第一时间联系河北企业赶制《通告》展板,在进京高速路口交接,连夜张挂在社区(村)大门口显著位路,为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依据。

下一步,黑庄户地区将进一步升级信息技术“武器”。为38个岗亭配备人脸识别和红外测温设备,并与“黑庄户地区人口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互通,提高通行效率和管控精准度。同时抓细抓实辖区企业复工后的疫情管控工作,严格实行出入证管理,坚决把好园区大门和企业户门。

(作者单位:朝阳区黑庄户乡政府)



## 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

文/侯 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必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也是社会治理最基础的单元和最深厚的支撑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

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就实了”。基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

础就越牢，越坚实，反之，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一、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强化党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党的领导不能缺失、不可替代。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基层的力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和龙头,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所依靠的最基本、最直接、最关键的力量。另一方面,只有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影响力增强了,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引导群众通过“合法、合规、合理”的方式,表达诉求、解决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 二、基层党组织应在方向上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方向性问题决定着治理道路的选择,直接影响治理成效。基层党组织必须以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统领基层治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之路。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实现治理绩效目标为引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确立权责明晰、分工负责、内在驱动、激励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责任链条。促进治理主体管理标准化、执行规范化、服务人性化和问责法治化,促使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要提

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寻求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社会合理调节与民众共治共享良性互动。

### 三、基层党组织应在组织上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要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各主体智慧,打破基层治理“自上而下”线型治理模式,构建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网状基层治理体系。要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社会基层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各类基层治理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要区分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功能定位,协调基层党委和政府之间、不同职能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治理举措。要坚持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在基层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和基层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开展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激发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要培育和壮大公益类社会组织,鼓励和引导各类活动团队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自治载体和平台,充分释放微主体的大能量。

### 四、基层党组织应在价值上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成员知识化程度的提高

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基层党组织应该自觉承担起宣传、实践核心价值的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思想认识、标准规则和行动规范,树立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导向。重视群众的社会心理服务和疏导机制建设,把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群众摒弃社会戾气,营造友好和谐互信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正直善良、勤劳俭朴等价值追求,提升群众文化涵养,制定乡(社)规民约。

### 五、基层党组织应在人才上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要以人才引领推动自治、德治、法治、共治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完善相关政策,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进行。加大实施“班长工程”实施力度,为基层治理实践培养一批关键人才,并通过他们推动一个领域工作的深入开展。挖掘社区自治、共治中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形成“滚雪球”的带动效应,为基层自治与共治提供人才保障。开展多层次人才培养,为社区自治、共治的深化拓展提供重要人才储备。

(作者:延庆区委党校副校长)



# 房山区发挥党建品牌优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文/卜晓朴 李斯语



“爸爸妈妈，你俩能早点回来吗？你们不回来，妹妹不睡觉，我好累呀。”每当看到大女儿发的信息，房山区司法局张学明的眼眶都会有些湿润。他和妻子积极响应区委“上一线、做贡献”号召，到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只能把3岁的小女儿交给上大学的大女儿照顾。

“上一线、做贡献”的不只是张学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房山区充分发挥“上一线、做贡献”党建品牌优势，在第一时间组织在职党员回社区（村）报到，开展“周末上一线、值守做贡献”等活动的同时，从区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派1470名干部下沉一线，与社区（村）干部携手共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同时，各街乡纷纷发挥党

建品牌重要作用，坚持把党建品牌的张力转化成基层组织力，催生抗“疫”战斗力，“防疫一线有我，我在一线防疫”蔚然成风，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越织越密。

## 发挥党建品牌优势，让疫情防控有力度

阻击战，党员干部必须打头阵。房山区持续深化“次序动员”机制，让党员干部冲在疫情防控最前面。

“今天开始，我就在卡口办公了！”

“马书记，这么冷的天，您要在卡口办公？！”

“咱们平时经常说的‘次序动员’，不就是让党员干部当先锋，普通群众得实惠吗？这种关键时候，

咱们支部就得冲在前头！”

阎村镇肖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志忠在村里卡口设置好的第一天就跟大伙儿这么说。

作为“次序动员”机制的发源地，阎村镇面对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在全面安排部署防控工作同时，第一时间启动这项“战时”机制，肖庄村党支部就在其中。“次序动员，党员先上，支部带头”，这就是马志忠的防控“法宝”。为此，他迅速把党支部搬到一线，召集“两委”干部在卡口现场成立了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并下设卡口检查、村域消毒、监督巡查等7个小队，按照“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普通群众的次序发动力量。年近花甲的马志忠每天和大家同时上岗、共同值守，“5+2”“白+黑”，饿了就吃泡面，困了就找个沙发躺会儿。“我是党员，也是村里的‘主心骨’，这种时候，必须冲在前边”，每次大家劝他不要这么“拼”时，他总是这样说。

在疫情防控大考面前，“次序动员”这项“老机制”不断焕发“新活力”，带领党员干部群众携手冲锋，共克难关。

## 发挥党建品牌优势，让疫情防控有韧度

人民战争，必须发动人民。房



山区积极发挥党建品牌的凝心聚力优势,构建群防群控强大合力。

“老公,你回家吃饭去吧,我来接岗了。”

“爸,这些居家观察人员的快递我都送完啦,今天的步数肯定能超过您。”

在城关街道永安西里社区值守岗,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为进一步充实防控人员力量,社区党支部依托“西里老街坊”党建品牌,以楼栋为单位,积极发动党员、居民代表、楼门组长、热心群众等 150 余人,组建“西里老街坊”志愿服务队,参与卡口值守、人员登记、测量体温等工作,战疫“父子兵”“母女花”“夫妻档”“全家福”等感人故事不断上演,他们用亲情传递着温暖,传递着力量,传递着希望……

离此不远的永兴达社区也不甘落后,社区党支部依托“永兴商户联盟”党建品牌,制定《商户联盟公约》,与辖区内 170 家商户签订《联盟承诺书》,每周定期开展防控宣传、商户环境卫生、消毒消杀、“一米线”自查互查等活动。

“这次防控时间长,压力大,但有了大家伙的共同参与,我们的工作就有了韧劲和底气。”永安西里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春艳说。

### 发挥党建品牌优势,让疫情防控有温度

刚性战疫,更需把爱传递。房山区依托党建品牌“为民、利民”特征,用心、用情、用爱为群众铸就一道“温暖防线”。

“租住在南广阳城,这里就是

你们的家。8 天了,观察期过半,送您家 8 个苹果,寓意平平安安。”2 月 5 日,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党支部书记石印起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冒着大雪,给满 8 天的居家观察人员送来了苹果。

七年准备,三年实践,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创造了一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广阳经验——书记真为民,支部真管事,党员真带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党支部书记石印起继续深化“广阳经验”,把自治、精治、共治、善治体现在了“隔离不隔爱”上。

收到惊喜的不只有南广阳租户,2 月 14 日,大安山乡的每名卡口值守人员都收到了一条“红围脖”。

“这围脖可真是起了大作用,这几天正冷,山上还一直下雪,我们正发愁该怎么办呢,现在围着咱们村妇女亲手织的围脖,我们暖在身上,更暖在心里啊!”

去年初,大安山乡在全乡党员干部中开展“红色天使在山乡”活动,机关科室和相关单位把办公桌直接设在群众家门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后,乡党委依托党建品牌优势,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疫情防控做贡献,喜爱编织、手艺出众的巧姑靓嫂们,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编织了围脖,党员干部为村民送去了“健康包”,乡村医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体温、量血压、上门理发,真正实现了“红色天使”遍山乡。

### 发挥党建品牌优势,让疫情防控有速度

疫情要防控,民生必须要保

障。房山区坚持把党建品牌优势既体现在增强防控工作的质量上,又体现在服务民生的效率效果上。

“请问是物业吗?我们家的地下管道堵了,现在这种时候,有工作人员上门修理吗?”

“您好,我们马上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服务,维修人员都会佩戴口罩、鞋套和消毒喷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减少与您的直接接触,您尽管放心。”

深夜,北控中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到了住户打来的电话。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燕山工委继续深化“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充分发挥“三呼三应”党建品牌作用,坚持“严格防控、未呼先应,面对需求、有呼必应,全民参与、一呼百应”,合理引导物业、各非公党委、小微企业党支部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联防联控、安全高效、规范有序开展,争创地区“零感染”。

面对燕山向阳街道向阳里社区为居家医学观察人员清理生活垃圾的难题,益龙泰家政公司迅速响应,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帮助社区解决燃眉之急;燕山星城街道发现菜市场关闭后居民买菜难,立即发出呼声,相关部门迅速协调,在孝廉文化广场设置“蔬菜直通车”,切实保障了居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工作“不打烊”,服务“不断档”,就是他们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生动概括。

(作者单位:房山区委组织部)



## 密云区垃圾分类成为开门“第八件事”

文/密云区委组织部

自《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以来,密云区坚持党建引领,切实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让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逐渐成为除居民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后的“开门第八件事”。

### 一、聚合力,构建多方联动机制

成立以区委书记和区长任组长,组织部长、分管副区长等区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八组”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建立每日汇报、每周联席会商、拉练检查等机制,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落实。严格落实镇街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社区(村)、村居干部包街(楼)、党员和村(居)民代表包户工作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做

实社区(村)党建协调委员会,将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垃圾分类专业服务和广大志愿者凝聚起来,成立联合党组织,形成工作合力。目前,通过党建协调委员会广泛征求居民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意见和建议,各社区党组织同物业服务企业制作垃圾投放点指示标识、横幅、点位图,方便居民准确投放。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作用,依托“三进四帮扶”“双报到”等机制,深化结对共建,指导帮助社区(村)党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提高社区(村)垃圾分类水平。

### 二、搭平台,创新活动载体

在全区范围内创新开展“学、守、做”活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围绕“提高站位学政策”,各基层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等方式,组织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区委相关工作要求,就如何发挥党组织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垃圾分类专题研讨。围绕“履行责任守承诺”,要求各单位领导班子、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与责任意识,主动签署垃圾分类承诺书,各党支部履行教育、管理、监督职责,对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配合的党员干部及时教育引导。围绕“身先垂范做表率”,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从身边小事做起,在家中主动设置“两桶一袋”,并将设置情况拍照报送至所在基层党组织,形成干部先行、党员垂范、全员参与的浓厚氛围。



## 延庆区“三个结合”考准考实干部政治素质

文/延庆区委组织部

延庆区坚持将政治素质考察作为创新干部选任方式的着力点和突破点,积极探索多样化考察路径和方法,力求精准考察评价干部政治素质,推进政治标准落地落实。

### 一、坚持“正向”与“反向”相结合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20字”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等要求,正反结合设置测评指标,力求政治表现看得清、好评价。

一是专项民意测评,了解政

治行为。研究制定干部政治表现正向评价谈话提纲,设计《拟提拔干部政治素质专项民主测评表》,按照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5个方面,设置18项政治表现正向测评内容,采取测评和个别谈话两种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测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不了解5个等次,最终形成干部政治素质测评分值。

二是德的反向调查,发现政治问题。修改完善《干部德的反向调查表》,突出政治品德在干部标准

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细化政治品德指标。围绕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内容,建立4个方面13项负面清单,改变以往“好不好”的评价方式为“有没有”,设置严重、不太严重、轻微、没有、不了解5类评价意见,赋予相应的分值权重,量化政治品德评价内容,使政治品德可对照、可评价。

### 二、坚持“一时”与“一贯”相结合

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待干

### 三、强示范,在职党员争当“桶前指导员”

制定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机关走在前、党员作表率争当垃圾分类“桶前指导员”活动的通知》,按照“区委主导、工委统筹、单位领导、街道协调、社区组织、党员值守”的组织形式,号召全区在职党员回社区担任“桶前指导员”。依托“双报到”在职党员临时党支部,以党小组为单位划分值守片

区和桶站,开展垃圾分类投放的指导、宣传和监督。7000余名在职党员纷纷从“卡口”走向“桶前”,每月参加一次“桶前值守”,从疫情防控的“守门员”“排查员”成为垃圾分类的“指导员”“宣传员”。进一步加强督导评价,实行“双报告”“双考核”工作机制,每次活动开展后,联络员及时向社区党组织报告,党员个人通过“党员E先锋”向所在机关单位党组织报告。各社区党组织对在职党员工作情

况按月进行评定,并向所在单位进行反馈,区直机关各单位党组织综合社区党组织反馈意见和在职党员日常表现,出具评价意见,作为党员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区委区直机关工委成立督导组,对各单位活动组织、在职党员履职情况开展常态化滚动式督导,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督查结果纳入年终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考核内容。



部,重点考察干部在不同岗位、不同环境、不同时间的政治表现,做到“一时”和“一贯”相结合。

一是规范考察程序,研判政治素质。将政治素质考察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各方面。初始提名环节,党组织对提名推荐人选的政治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动议环节,

二是注重日常考察,下足平时功夫。坚持把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由“八小时”之内向“八小时”之外延伸,盯紧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政治表现。深入到考察对象居住地所在社区、村,了解考察对象政治表现、服务社区等情况。探索“干部家访”制度,跟考察对象

### 三、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在严格遵照传统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静态考察方法进行政治素质考察的同时,注重把干部放在一线工作中进行动态考察,避免“一次考察定终身”可能造成的失误。

一是实行历练式考察。结合部机关干部“全员下基层、调研抓落实”主题实践活动,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单位开展调研,通过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全面动态了解领导干部在基层服务一线、重大项目一线的真实表现,特别是在推动服务保障世园冬奥、征地拆迁、环保攻坚、民生保障、接诉即办等工作任务落实过程中的政治意识、政治担当和斗争精神。日常工作中,通过给干部压担子、交任务、派到艰苦地区锻炼,观察干部的服从意识、公仆意识和奉献精神。

二是实行跟踪式考评。对考察中政治表现突出的干部,加大培养使用力度;对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取消考察对象资格,并采取面对面方式及时反馈干部本人。对问题较多的干部,要求干部根据反馈意见列出整改清单,区委组织部和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加强跟踪管理,督促限期整改,动态掌握干部的新状态、新变化。针对考察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全区干部政治素质。



组织部门对动议对象政治表现进行说明;考察环节,将政治表现作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和查阅干部人事档案等环节的重要内容;会议研究环节,把政治表现作为重点汇报内容,参会人员拟任人选政治表现作出表态性评价;材料环节,将政治表现材料存入人事档案。最终,综合分析研判各环节考察结果,将结果运用到干部选拔任用、培养锻炼和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引导广大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

配偶进行延伸谈话,了解干部的政治观念、脾气秉性等方面情况,通过直接了解和侧面印证,进一步考察了解干部,排查“两面人”。制定下发《关于在教育培训中考察识别干部的工作方案(试行)》,将干部的政治素质细化为党性修养、理论水平、道德品质三项评价要素,坚持“考学评人”,通过多种形式,了解干部在培训期间的政治表现,并形成每人一份的白描式政治素质评价材料,为干部考察提供重要参考。



## 大兴区健全机制强化农村“领头雁”管理

文/黄俞创

为加强农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大兴区从选拔任用、日常管理、关爱激励等方面着力,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对农村党组织书记实行全过程、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提升农村“领头雁”队伍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严入口,选拔任用规范化。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任用程序的通知》,坚持“凡动必备”,凡涉及村党组织书记职务变动的,按照动议提名、初步沟通、镇街初审、报送请示、区级复审等 9 个步骤流程进行区级备案。区委组织部会同纪委、政法、公安、信访等 13 个区级部门对村党组织书记正式建议人选进行联合复审,对存在受过刑事处罚、涉黑涉恶、非法占地和违法建设等 10 种情形的取消人选资格。组成区镇联合考察组,采取民主测评、个别访谈、随机走访等 3 种方式对正式人选进行实地考察,组织包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普通群众等不少于 30 人进行现场无记名测评,开展不少于 20 人的“一对一”谈话,随机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确保考准考实。镇党委会、区委组织部部务会根据资格联审和联合

考察情况进行研究审议,最后确定人选并宣布任命。

强约束,管理机制长效化。印发《关于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将全区 526 名现任村党组织书记全部纳入规范化管理,建立村党组织书记信息管理、因私出国(境)审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区级全员培训、经济责任审计等 9 项管理监督制度,动态更新村党组织书记个人基本情况、主要工作经历、履职业绩等 6 方面信息情况,要求每名村党组织书记每年参加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时间不少于 56 学时,围绕婚姻、收入、房产、投资等 4 方面每年集中报告 1 次个人事项,联村党总支书记每月至少与总支内党组织书记谈心谈话 1 次,镇党委至少开展 1 次党组织书记届中审计。制定《不胜任不尽职村党组织书记调整办法》,对于出现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落实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不到位、党员群众意见大等 12 种情形之一的党组织书记及时进行调整。规范“四议一审两公开”“三务公开”等制度,修订形成 15 章共 113 条新版《大兴区村级工作管理规则》,从村党支部和

村委会运行,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村书记依法依规正确履职。

重保障,考核激励科学化。提高村党组织书记经济待遇,制定《村干部工作报酬调整办法》,实行“基本报酬+绩效奖励”结构报酬制度,规定村书记每月基本报酬不得低于 4000 元,并按月足额发放,每 3 年动态调整 1 次,绩效奖励年平均值要达到 9 万元,村书记年平均收入达到 14 万元。深化定目标、定奖惩、个人自评、群众测评、组织考评“两定三评”机制全面科学评价村干部工作。落实村干部参加社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正常离任补贴政策,注重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考试录用镇机关公务员、招聘镇事业编制人员,拓宽村党组织书记成长空间。积极推荐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担任各级“两代表一委员”。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受到诬告的村党组织书记及时澄清事实、还其公道。探索建立一批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工作室,不断总结推广成功做法,宣传表彰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激励党组织书记担当作为。

(作者单位:大兴区委组织部)



薄弱村林下经济试点”范围。目前,该村林下经济工作方案已经报送党委会审议通过,第一期 150 亩林下中草药已经完成种植。下一步,将在保护好集体林木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其余可利用的 550 亩林地,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努力形成适合北京地区的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类型、经验和模式。

#### 四、打造康养文旅产业链条

坚持康养文旅产业定位,发挥村庄水岸田园资源优势,通过要素整合,建设“一轴、两带、多

片区”农旅康养融合田园综合体。“一轴”:以孔兴路为产业轴线,实现特色产业有效串联。“两带”:建设凤港减河和港沟河滨水绿带,实现产村融合。“多片区”:“生态亲子农场体验区”“林下观光科普采摘体验区”“健康+科技体验区”等。借助市委宣传部助力搭建的快手等宣传平台,探索运用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立体推荐军屯村。目前,“健康+科技体验区”项目已与区科委初步沟通;“特色乡村生活体验区”建设已开展前期摸底,后期将根据客流量推动村内闲置农宅利用,开发特色餐饮服务;“京华大地潮县军屯”快手账号已完成加 V 认证,第一批宣传资料已推出。

## 因地制宜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文/北京市第一书记联络办公室

通州区潮县镇军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吕玮驻村以来,会同村“两委”干部共同谋划村庄产业发展,推出四项措施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 一、改造村内基础设施

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村内供水管线老化严重、爆裂停水时有发生的问题,积极与派出单位市发改委对接,推动本村污水项目早评估、早落地。目前,军屯村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已完成评估,近期获得批复后,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施工要求,完成村内供排水管网建设,接下来将邀请专业力量,形成村庄绿化美化专题设计方案,逐步提高村庄绿化美化水平。

### 二、发挥集体土地撬动作用

积极申请区政府设施农业补贴建造蔬菜大棚,与北京裕农高品质蔬菜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签订订单化种植合作协议。开发“农心童趣”亲子菜园,为市民和孩子们提供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乐园。目前,亲子菜园已完成土地整理,正在实施节水灌溉设施安装,有望今年推向市场。引进京农集团 8 个品种、成熟期从 6 月至 11 月的高效矮化密植大桃品种,建成优质果品实验田,明年将根据实验田果品质量,择优扩大种植面积。

### 三、推进林下经济试点

积极向市级有关部门申请,将军屯村纳入全市 21 个“集体经济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留住美丽乡村》《生存的基础——农业社会学特性及其政府责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农民参与土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乡村旅游与城乡一体化》《农业社会学》等。

## 乡村文化载体之乡村空间

### ——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乡风文明(五)

文/朱启臻

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礼义之邦”著称世界民族之林。在乡村，尊老爱幼、上慈下孝、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优秀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但是，这些文化的载体在哪里？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传统文化的载体，唯有彻底明白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出现建设性破坏，才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好。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就在乡村。由于传统文化内容包罗万象，每一类文化的存在空间、呈现形态都是不同的。如，邻里互助文化与地方戏曲的载体不同；均是手工艺文化，剪纸与编织存在的条件不同；婚礼、葬礼与美食文化传承的空间也不同。诸如此类，难以穷尽。

这里，我们仅以孝文化为例，探讨其承载的空间载体。

“孝”作为一种信仰和行为准则，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孝文化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在孝文化的熏陶下，个人能够做到“上不欺天、下不害物，内心平和中正，自立利他”，我们的精神、信仰和修养就达到了新的境界。孝文化有助于规范家庭成员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也因此顺理成章。当尊老爱幼的孝观念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人们相互之间友爱与尊敬的社会风尚就蔚然成风；孝文化也是

爱国情怀的根源和动力，对凝聚民族精神意义重大。当今社会，孝文化如何传承与保存，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这里，我们仅从乡村空间形态、乡村生产与生活等方面论述孝文化的传承问题，旨在帮助人们认识乡村文化载体的意义。

从乡村空间看，乡村哪些地方可以成为孝文化传承的载体呢？

#### 一、农户院落

在华北地区，就是普通的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也很有讲究。中间一间称为中堂，是民宅的中心，功能最为复杂，堂桌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当今大都改为“天地国亲师”）之神位。在“天地君亲师”排位的左侧，供奉的是祖先，右侧多供奉灶王或观音。有的家庭把先人的画像或照片也挂上去。在所供奉的牌位的两侧，一般挂有对联，如“天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宗功师范长”等。这是家中最重要的地方，逢年过节，敬天地，拜祖先、供奉家族牌位以及烧香磕头等活动都是在这里完成，是举行家庭祭祀和重大仪式的场所。

中堂同时也是家中长辈会见客人的地方。按传统礼数，不仅主人与客人的位次颇为讲究，长辈和晚辈的座次也有严格的尊卑有序规定。东西各一间卧室，东侧为上，是家庭中长辈住的，西侧为下，是晚辈住



的。如果有厢房,则正房长辈居住,厢房晚辈居住。可见,传统民宅建造不单为人们提供日常居住和审美的需求,而是把尊卑有序的伦理隐喻性镌刻在民宅建筑中,并赋予民宅建筑严格、深刻的道德规定。

## 二、空间的开放性

村落里的农户是透明的,透明到几乎少有隐私,把自己所有行为和家中事务都置于阳光之下。这种空间开放特性,带来了多方面的社会建设意义。

首先,形成村落监督机制。只有透明才能监督,这种开放状态使得每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每个人心里清楚“大家在看着我”,尽量避免不符合村规民约的言行举止,也尽量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大多数村民期望,这是村落人行为的自我约束。村落监督现象以及村落里对人的行为监督和矫正途径十分丰富且无处不在。

其次,示范与模仿。由于农户空间的开放性,谁家做得好,大家都清楚,就会受到村落舆论的奖励,就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反之也一样,谁做得不好,行为不符合村落共同期望,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群体的排斥。这在封闭的城市社区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乡村评好媳妇、好公婆互动,对乡村乡风文明建设十分有效。

最后,反复强化。村落教化具有周而复始反复强化的特性。这种强化不同于学校教师惩罚学生时采用的机械性复读或复写,而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如婚礼、葬礼、节日活动、盖房子与春耕秋收的互助以及矛盾调节等,都是经常的、周而复始的。相应的对人的教化作用也是经常的、反复的、周期性的。

## 三、村落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包括传统的祠堂、庙宇、戏台,今天的文化礼堂、文化大院、活动中心、敬老院以及其他标志性建筑等,大都具有孝文化传播功能。特别是祠堂,作为家族的重要标识之一,对孝文化的承载已有太多的研究成果。祠堂作为重要的家族象征符号,依靠“尊祖敬宗”的孝道,把后人与祖先、个人与家族置于血缘脉络系统中,通过树立家族权威与伦理,伸延传统敬老养老观念。

祠堂建筑威严,渗透着崇老、敬老理念,宗族中的每个人都对祠堂有敬畏感,祠堂在建筑上采用多种措施来强化这一效果。一方面,祠堂建筑上的装饰与梁上的匾额、题跋、装裱的“状元”“进士”“左丞相”之类

的功名牌匾,还会悬挂有“孝义”“忠慈”字样匾额等来提升祠堂的地位。尽管这些匾额是个人“功名”“品德”的荣誉象征,但实质凸显了家族祠堂的地位,导致祠堂在成员心目中权威上升。另一方面,祠堂是惩恶的重要载体,而“不孝”是惩“恶”的重要内容。过去祠堂内部都悬着藤条,祠堂正厅立有石柱。凡有人严重违背家规、族约,都会被捆在石柱上,用藤条抽打。不孝敬父母被列为首条重罪,严重者甚至要被逐出祠堂。祠堂作为建筑实体勾连着孝道观念与人伦秩序,以此为中心,凝聚着整个家族,支撑了孝文化的传承。

## 四、祖坟

对中国人而言,“生养死葬”是最正常的生命历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中国人对待死者的终极态度。“坟”作为亡灵的宅基地,在乡村社会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坟地”安放死者的灵魂,寄托着子孙的哀思,是村民日常宗教生活、“慎终追远”行为的具体场所,是维系农民本体性价值的重要社会空间。它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农民的生死焦虑问题,实现了农民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正是这种“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实践性日常生活,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日常表达,最终成为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具体日常生活中,这既表现在一系列严整的丧葬礼仪,更体现为葬后的日常祭祀。尤其是日常祭祀,是寄托生者的哀思与感恩,表达代际之间永远无法报答的“情债”,并达成生者日常生活中的心灵平衡的重要手段。

“阴宅”也是维系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支撑了村民的“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基本宗教,另一方面,更连带着“一束”文化因子,织就了一张强大的“文化网络”。在这张“文化网络”上,“尊尊亲亲”“长幼人伦”等都是重要的节点。正是这张“文化网络”成为传统村庄社会团结的最主要“黏合剂”,而有效的社会团结是“社会得以可能”的重要保障,是村庄内生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和支撑。坟作为生者与死者的情感纽带,对警示和教育活着的人应具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如何对待家人、朋友,如何处事待物,正是有了“坟”这样的情感和文化载体,人们才可以借此表达感情,维系人伦关系和人际秩序,思考人生。



## 北京市农研中心与密云区签订合作协议

文/本刊

2020年6月5日上午,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一级巡视员张光连一行,在密云区与区委常委、副区长朱锡才签署了《共同促进密云区农村经济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市农研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志强和刘军萍,办公室、调研综合处、城乡发展处、资源区划处、金融处、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和市农财中心的负责人,以及密云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见证了协议签署仪式。

按照协议,未来三年内,密云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市农研中心将开展重点课题调查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题培训、农村经济创新试点、青年人才交流培养等合作内容。双方将充分发挥密云区的乡村发展实践优势和农研中心的经济研究理论优势,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精心选择合作项目,助力密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落实新发展理念、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合作开展调查研究方面,双方研究决定,根据密云区发展农村经济及实施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每年确定1至2个重点课题进行合

作研究。结合实际,今年双方计划从城乡融合发展、闲置农宅利用、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及农民合作组织提质增效等方面选取与密云生态涵养区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组织课题组到密云区实地开展驻村入户调研,并将密云区作为市农研中心常态化调研基地。

目前,市农研中心配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北京市“十四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密云区可以成为编制规划的重要调研目的地。鉴于密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市农研中心将配合其总结推广合作社发展经验,协助完成密云区“十四·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划编制任务,进一步提高密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和效益。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题培训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密云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全区现有1494家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涵盖种植、养殖、果品、产销、民俗旅游、农机等产业领域。此外,密云区现有327个以行政村为建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农研中心负责配合密云区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教育工作。双方合作培训计划采取市

内课堂教学与市外实地考察相结合。按照计划,将在密云区举办一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人員培训班,围绕农旅融合发展、品牌农业塑造、信息化营销手段、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联接机制、集体资产规范管理等方面设置课程。市外培训方面,计划9月下旬组织学员赴浙江考察,选择湖州市安吉县和吴兴区作为市外培训参访点。

农经工作创新试点方面,围绕生态涵养区乡村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径选择。根据双方议定,将溪翁庄镇东营子村作为城乡融合发展项目试点,由市农研中心提供技术力量支持提出具体工作方案并协助抓好落实。市农研中心协助密云区做好农业资源区划资料汇编与产业布局试点工作。此外,双方还将开展青年人才合作交流培养试点。密云区拥有一批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具有实践经验“一懂二爱”的新农人。市农研中心拥有一批掌握农业农村政策、富有“三农”情怀的青年调研队伍,双方将积极为年轻人搭建调研合作平台,共同促进双方青年携手前行,在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中开展务实合作。



## 第40期农研智库大讲堂:纵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文/李婷婷



为准确把握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促进首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积极参与做好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6月12日下午,市农研中心特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核心区控规技术总负责人石晓冬做客2020年第2期周末大讲堂(总第96期)暨第40期农研智库大讲堂,为大家作“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时代使命与治理转型”

专题报告。

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志强,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刘军萍,中心二级巡视员熊文武出席大讲堂。市农研中心各处室、单位干部职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处室人员,市委党校有关专家等70余人参加大讲堂。市农研中心调研综合处处长张英洪研究员主持大讲堂。

石晓冬长期从事城市总体规划、战略研究、城市设计、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等领域研究工作,获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兼任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他主持的重要规划项目获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金奖一项,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五项、二等奖六项。

此次大讲堂上,石晓冬首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两个文件,为大家讲解了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之后,他结合时代背景简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编制的七版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国家 and 首都发展关键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着重介绍了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和在理念、重点、方法上的新突破。

据介绍,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总体规划的前期准备和启动阶段(2014年);其次是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形成总体规划草案阶段(2015—2016年);最后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修改完善,形成总体规划送审稿上报党中央、国务院阶段(2017年)。他总结了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5个经验:加强组织领导抓落实,通过任务清单抓分解,完善规划体系抓布局,深化改革创新抓突破和开展城市体检抓监测。

最后,石晓冬从城乡统筹视角为大家解读了新版北京总体规划

城乡统筹发展部分。他认为,新版城市总规讨论的起点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首都”,这其中暗含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因此,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在战略上进行了突破,强调城乡统筹和全域空间管制。他指出,全市土地按权属划分,集体性质土地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2%,可以说,北京是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大农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一块重要的资源、一个巨大的市场,也隐藏着问题和矛盾。集体建设用地数量大、布局散、效益低、历史遗留问题多,改善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是优化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既是蓄积利益冲突的火药桶,又是缓解城乡社会矛盾的减震器、平衡器。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谋划,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城镇与农村、平原

与山区各自优势与作用,优化完善功能互补、特色分明、融合发展的网络型城镇格局。加快人口城镇化和经济结构城镇化进程,构建和谐共生的城乡关系,形成城乡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成为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治理的典范。

张英洪在总结中指出,石院长的报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体现了专业水准,对我们编制“十四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思路、重点、要求很清晰,对首都农村的发展方向也很明确。如何在新总规的龙头引导下做好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是我们工作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希望大家在讲座后能认真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乡村,如何使乡村体现首都功能,共同做好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

(作者单位:北京市农研中心调研综合处)





## 二十二载领头雁 精耕细作凤来仪

文/杨富文

今年,63岁的孙长秋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这位有着40年党龄的老书记,自1998年至今,连任怀柔区桥梓镇后桥梓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以“为村谋发展、为民谋福利”为宗旨,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经过22载精耕细作,后桥梓村党支部由弱到强、集体经济从负到富、人居环境由乱到美、乡风文明由差到好。

2015年以来,孙长秋先后荣

获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先进个人等十余个区级以上荣誉。作为领头雁的他,带领后桥梓村荣获了市级“五个好”村级党组织、首都文明村、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健康促进示范村等多项殊荣。2019年,村社会经济总收入超过3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5175元,股份分红可分配利润583.4万元,是桥梓镇唯一一个

有利润分配的村,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 一、振兴组织,固本强基

孙长秋在2015年和2018年连续两届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连续6届连选连任并书记主任一身兼,这正是党员和村民对他信任和认可的最可靠、最淳朴的意愿表达。早在二十多年前,他上任伊始就从狠抓班子建设入手,各项工作以党支部为核心,各项工作开展严格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坚持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不仅带出了一支稳定团结、战斗力强的“两委”班子,还带出了一支优秀的党员先锋队。

一是抓班子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后桥梓村紧邻镇政府,距怀柔城区4公里,村域面积3.29平方公里,有877户1761人,其中党员92名、村民代表31名,村“两委”干部全部交叉任职。管理这样一个大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此,孙长秋结合本村实际,建立了一系列长效管理机制,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长期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同时,先后制定并严格实施了《干部职责管理制度》《党员活动积分管理制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管理制度》《出租房屋及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和《村规民约》等十多项量身定做的自治措施。“两委”班子和村民共同遵守,各项制度均与村民福利挂钩,一切都公开透明,不仅让“两委”班子之间更加团结信任,更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二是抓学习教育,用理论凝聚共识。2016年之前,孙长秋组织村内开办了文明大讲堂,平均每月至少组织2次活动,党员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后来班子成员意识到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重要性,经联系,他们同区委党校合作,在全区首建村级党校,并

与前辛庄村成立联合支部组织两村党员干部共同学习。后桥梓村级党校自2016年成立以来,定期开展农村党员群众培训工作,坚持二级班子成员上党课制度,同时,每年邀请驻村工作站站长、外请专家教授给全体党员上党课。内容涉及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孝道等多方面,近4年累计开展活动50余场次,受众逾5000人次,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三是抓志愿服务,用行动表达初心使命。成立了党员文化宣传服务、环境卫生服务和治安服务3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全村各项建设中凸显了模范带头作用。如,文化宣传服务队,走街入户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环境卫生服务队,走上街头锄草、清路、捡拾垃圾;治安服务队,不定时巡逻在背街窄巷,为村民人身安全保驾护航,党员亮身份,先锋模范作用处处得到体现。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在孙长秋带领下,该村党员志愿服务队已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110场次,参与党员500多人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

## 二、治理有效,文明乡风

后桥梓村连续十几年“无违章建筑、无乱堆乱放、无暴露垃

圾、无卫生死角、无污水外流、无犬类上街”,村内社会秩序良好,无集体访、越级访发生。如此成效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有着孙长秋的独特解决之道。

一是直面问题敢碰硬。孙长秋带领着4名村干部以“善于想事、勤于做事、勇于担当、敢于碰硬、公平正义”为行为准则,坚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充分发挥雁阵作用。针对在发展过程中该村曾面临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安不太稳定、环境卫生较差等诸多问题,孙长秋上任后,敢于直面问题、碰硬茬,逐步解决了村级发展中存在的难题障碍。二十多年前,由于村办企业未能及时改制造成村集体负债累累。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及时调整思路,果断采取改革措施,进行企业改制,在推行此项改革工作中,伤害了一小部分人利益,由此产生积怨。以致出现上访、告状,在此期间,村委会换届野蛮竞争成风、干群矛盾一触即发、社会治安混乱。面对这些“硬茬”棘手问题,孙长秋没有走隐瞒或者老好人路线,而是带着村班子成员逐户征求村民意见,特别是深入到上访户家中了解情况,为他们排忧解难,用真情赢得了村民的信赖与支持,后桥梓村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二是“三风”活动育民心。为进一步巩固成果,孙长秋与“两



委”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在全村范围内以树家风、正村风、淳民风为主要内容,开展“学习雷锋精神,树立良好三风”活动。给每户村民发放了一套雷锋系列丛书,使雷锋精神深入人心。鼓励培育出好家风户,并将全家福照片和家风家训牌匾敲锣打鼓送到好家风户中,使鲜活的案例从少数向多数延伸。2017年,经过向党员、村民代表、村民征求意见和建议,后桥梓村形成了“秉持礼法仁孝重视素质教育”的村风,并以彩绘3D效果呈现在文化墙上。这些文化墙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可以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引导,使大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进一步改变了村风、改善了民风。

### 三、产业兴旺,百姓享福

生活环境好了,社会秩序井然,孙长秋面临的又一问题是如何给村民谋求更大的幸福?

一是壮大集体“金饭碗”。一方面,早在2003年,该村就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整体规划布局,利用村北150亩工业用地,自筹资金200万元,建成4044.82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一座,开始招商引资。3年间先后引进企业6家,5年时间实现了本村经济发展目标,在土地达到稳步增值的同时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过去满大街闲逛的无业青年不见了,后桥梓实现了劳动力人人能就业、月月有收入,村级经济发展上了新

水平。另一方面,对传统农业进行转型升级。2016年,孙长秋带领大家进一步转变经营方式,将传统的大田农业调整为休闲观光农业,当年种植油葵500亩,实现了花期供游客观光、花落花籽榨油的双丰收,同时,建设采摘果园420亩、牡丹园150亩。经过几年努力,2019年实现农业综合收入750余万元。

二是改造人居“靓家园”。“集体有了钱,一定要为群众多办实实在在的好事。”孙长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他不断争取资金用于村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村里修建了二类公厕2个,在治理后的荒沟上铺建柏油路300多米,建成了占地30多亩的绿化公园、3处文化健身广场、2个村级活动中心。完成了全村自来水改造和污水排放及街道硬化、户厕改造工程,各条街道和胡同全部得到亮化。同时,该村在原有环境建设成果上,以“走进去,看一看”参观模式,开展美丽庭院建设,带领广大党员先行动起来。每个党员家必须达到精品户的“四美标准”,对自己网格化管理的村民户,至少有三分之二户达到标准,带领全村350余户达到美丽庭院标准,推进了“三精一美”区域特色建设。

三是百姓满载“幸福感”。因为有了集体经济带来的“金饭碗”,后桥梓村民享受的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如,60岁以上老人

福利待遇每月可领400元,每年春节给全体村民发放福利米面油肉,村民享受50%的合作医疗保险补贴,每年村里免费供应村民口粮小麦每人261斤,每月免费供应村民每人生活用水1方,重阳节村里每个老人可享受价值200多元的礼物一份,村民孩子考上大学还有奖学金,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分红年年增长。现在每年村里村民福利这一项开支就达300多万元。特别是老年人,生活有了保障,减轻了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村民真正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心里满满都是幸福感。

在村民心里,孙长秋不仅心系村民,在大事上更是有担当、敢担当的领头雁,APEC安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安保,他都一直和党员干部们值守在一线。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当天,当他得知疫情讯息后,立即住到了村委会办公室,喇叭广播、排兵布阵、严防死守,正月初三就在村口设置了岗哨、制作出入证进行登记管理,有村民将一张孙长秋深夜巡逻的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附了一首打油诗:“老书记心系群众,新党员担当应战。众百姓抗疫激昂,攥铁拳重击新冠。”孙长秋,后桥梓村22载的领头雁,如今63岁的他还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作者单位:怀柔区委党校)



门头沟区『五抓五强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文\符乃清

为确保 2020 年底如期脱低,门头沟区克服疫情影响,分级精准防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巩固前期低收入帮扶成果,创新建立“五抓五强化”工作方法,从产业、就业、救助三方面持续深化帮扶举措。

### 一、抓党建,强化产业帮扶成效

在红色党建引领下,强化低收入村领导班子建设,增强脱低增收信心,深入挖掘村域资源禀赋,实现绿色发展,当“两山”理论的守护人,吃生态饭,捧上金饭碗。立足生态,发展适宜门头沟区资源禀赋的“门头沟小院+”高端民宿产业,深化精品蔬菜种植等附加值高的产业,拓宽低收入户增收和低收入村发展途径,进一步促农增收,形成持续增收的良好态势。完善利益长效联结机制和模式,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实现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

### 二、抓基础,强化帮扶工作成效

在严格程序开展动态管理基础上,建立监测返低预警机制,对全区低收入农户进行精准分析,确定重点关注“五类人群”(低于 13000 元、低于 12000 元、低于 11200 元、返低风险户、不稳定户),精准聚焦收入短板,分析预判脱低时间,结合党员干部“一对一”精准帮扶对接台账,完善“帮扶单位与镇村、党员干部与低收入农户”的双对接机制,确保脱低路上一个不掉队。建立月调度机制,每月月底召开

调度会,统筹各相关部门,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发现解决帮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出现工作死角。探索长效帮扶机制,保持现有政策稳步落实,严格落实脱低不丢责任、不丢政策、不丢帮扶、不丢监管,从产业、就业、基金等方面全面探索长效机制的建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三、抓督查,强化帮扶工作质量

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出台《门头沟区 2020 年低收入帮扶工作督查方案》,对各相关单位和各镇采取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形式,对照建档立卡信息和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全面排查帮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杜绝数字脱低、虚假脱低,确保已脱低户经得起检验,切实解决帮扶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问题,倒逼帮扶工作高质高效、快速推进,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 四、抓机制,强化“造血”内生动力

加强帮扶工作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进一步激发低收入村、低收入农户自我增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持续推进全面脱低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激发低收入村内生动力。探索建立“短期+长期”就业帮扶模式,大力促进低收入农户转移就业,创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路径,开发更多绿色生态公益性就业岗位。深化市级单位结对帮扶、与西城区合作、“8+1”行动等,不断增强“造血”能力,确保低收入农户长期稳定增收。

### 五、抓典型,强化宣传带动作用

提高宣传广度深度,及时梳理总结精准帮扶、产业项目等典型经验、成功案例和工作成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切实发挥“北京门头沟精准帮扶信息网”作用,及时发布帮扶工作信息、政策、成果及区内优质资源,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帮扶,激发低收入村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活力,通过推进“互联网+精准帮扶”模式,巩固完善以信息网络为支撑的精准帮扶新途径。

(作者单位:门头沟区农业农村局)



## 冬奥延庆赛区重点工程将于年底竣工

文/董明昊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延庆赛区有 13 项在建工程，核心区内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以及外围的延庆综合交通服务中心(换乘中心)、冬奥森林公园等重点工程，按照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完工。目前，小海陀山的青山深谷中，绿意盎然，场馆已露雏形。

在核心区的一块狭长山坡上，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犹如一条巨龙盘旋舞动。自 2018 年 1 月正式进场施工以来，上海宝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党支部书记姚远全程参与了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者们攻坚克难，先后完成了赛道实验段国际单项组织认证、赛道主体结构完工、赛道合龙贯通、制冰等诸多重要节点目标。如今，看到曾经围绕着龙身的钢铁脚手架和绿色罩网大多被撤离，巨龙即将腾飞在青山绿水间，姚远心中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建设者，我亲眼见证了这条赛道从无到有，见证建设人员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阻碍。在这一过程中，我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也为能够在冬奥会这样的平台上展示中国的建筑力量而倍感自豪。”姚远说，“今年是冬奥核心区诸多在建项目的收官之年，再过不久，这条赛道将迎来一系列赛事。我们将高质量、高标准做好最后的施工工作，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

站在巨龙身旁遥望高的小海陀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赛道清晰可见，在巨龙南侧，山地新闻中心的身影越发清晰。冬奥延庆赛区的工程建设者们驻守工地，昼夜不分地忙碌着。目前，延庆赛区核心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已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90%，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完成总工程量的 88%；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总体任务进度已经过半；西大庄科升级改造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今年年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及相关配套设

施项目将全面竣工，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也将在世人面前惊艳亮相。

与此同时，延庆火车站北侧，承担着京张高铁延庆支线火车站功能的换乘中心建设工程已接近尾声。银白色的屋顶好似蜿蜒的河水自西向东“倾泻而下”，南立面玻璃幕墙全部安装完毕。候车大厅内，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石材、墙面陶板安装等收尾工作。而在中心北广场，路面硬化施工和景观绿植栽种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目前，换乘中心的各项施工进入“收边收口”阶段。

据了解，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重点配套工程，换乘中心是集高铁、市郊铁路、公交、出租车、自行车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枢纽，将在冬奥会期间承担观众的交通转换及服务功能。待投入使用后，换乘中心将服务于延庆市民日常活动及通勤，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出行方式。届时，从北京城区乘坐高铁到延庆支线火车站只需 30 分钟。

包括换乘中心在内，延庆共有在建冬奥配套基础设施 10 余项。其中，部分冬奥会赛区外移动通信基站已开通信号，佛峪口水库水源保护工程完成 69%；公交停保中心底板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工作已经完成；延庆冬奥森林公园工程建设完成近 80%，其它各项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中。

为推进冬奥工程建设，延庆区住建委(重大办)聚焦重大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依托冬奥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和工程建设组的统筹协调作用，通过周例会、专题会、现场督办等形式，协调各建设单位、施工总包单位推进工程建设。同时，各专班联合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抓好赛区安全生产、扬尘治理、松闫路交通管控、疫情防控和工程质量验收等工作，确保赛区安全稳定，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作者单位：延庆区融媒体中心)



##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成立

文/张佳玮 赵青

6月12日,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市科委会同怀柔区牵头推进,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数学学科资源优势单位,由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领衔筹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在怀柔区成立。

研究院是北京布局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战略安排,旨在落实国家基础研究战略部署,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搭建数学学科与产业应用连接的桥梁,为实现重大技术难题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市科委主任许强介绍,经市政府批准,研究院定位为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由市政府支持

建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终身教授丘成桐出任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杨乐担任理事长。

研究方向方面,研究院明确“国家战略、世界一流、国际引领”的目标要求,瞄准前沿基础理论和关键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战略需求,主要围绕数学物理与理论物理、材料科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图像科学、大尺度建模与计算、统计方法与数据科学等与数学相关的重大应用领域和研究方向,建设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和聚集一流科研团队。

科研与产业结合方面,研究院致力于搭建数学研究与产业应用密切结合、数学家和企业家互动沟通的开放平台,畅通数学家与工程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渠道,根据产业行业需求凝练形成应用数学主攻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争取形成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丘成桐在致辞中对北京市政府关注基础科学、高精尖产业发展,积极为研究院组建营造良好环境的务实高效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将带领研究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融合实现多元发展,努力提升北京在世界数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当天,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



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探索、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更好地发挥数学科学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

研究院永久办公地落在怀柔区,将与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创新资源形成互动、互相促进。据了解,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建重大科技项目26个。这些项目将构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科教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高效协同的支撑格局,怀柔正加快成为全国科技设施最密集、原始创新最前沿、国际特色最突出的区域之一。

今年5月,创业黑马科创加速总部基地、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产业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有色金属新材料科创园等一批创新主体在怀柔相继成立,科技创新生态加速集聚。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标志着百年科学城翻开了崭新篇章,必将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强大动力。”怀柔区委书记、怀柔科学城党工委书记戴彬彬表示,将全力以赴服务保障研究院建设,及时帮助解决研究院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全方位打造一流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院地

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同时,将紧密对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需要,全面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和新型城市形态,以突破科学城市建设统领区域各类功能要素融合发展,努力为服务首都科创中心建设贡献怀柔力量。

据了解,与其“国家战略、世界一流、国际引领”的目标相适应,研究院的规划建设理念同样先进。研究院选址北京金隅集团下属企业北京兴发水泥厂,占地面积2530.5亩,年产能100万吨。2015年6月,为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加快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实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金隅集团主动提前将其关停。地处怀柔科学城北区,往南就是汇集着重大科技研发平台集群的核心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怀柔区与金隅集团密切对接,加快项目转型升级。

“怀柔科学城要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与这个目标相匹配,我们进行了概念规划方案国际征集,选择国际知名、富有改造经验的设计团队,设计理念、设计方法等与世界高端研究机构比肩。以国际一流视角,综合调配多种设计手法,全方位全周期打造科学家园区。”金隅地产副总经理李海波介绍说。

据了解,项目规划厂区内现状主要为水泥厂生产用房及运输铁路,工业建筑风貌特色突出,有生料磨房、碎石库、烧成窑尾等大量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1.6万平

方米。

建筑规划设计充分尊重原水泥厂工业建筑整体风貌,遵循老式工业遗风,在满足使用功能基础上,保留典型工业符号。最终确定了54处保留建筑,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并从立面、屋面材质、色调等多角度,采用素混凝土与红砖等原厂区典型符号,呼应园区历史遗迹及自然脉络;充分考虑保留现有火车轨道,将其作为园区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景观。项目远望河防口长城,总体规划形态及建筑单体设计注重与周边自然山体、景观环境和谐统一。矿区将全部还绿,依托山势进行恢复,打造立体式绿色空间。

据悉,整体改造项目分为五个功能区,包括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综合管理服务区、高等研究院、专家工作室区、孵化器办公区,可容纳约5000人办公。其中,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主要建设教学科研区、科学大讲堂、实验室区、文体休闲区及其他基础设施,计划2021年底交付使用。

未来,这里将以科技研发、应用研究、高精尖产业入园发展,实现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建设以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为代表的高等研究机构聚集区,打造世界前沿的多功能科学园区,建设成为怀柔科学城“皇冠上的明珠”。

(作者单位:怀柔区委宣传部)



近年来,延庆区珍珠泉乡上水沟村流苏茶示范园内一派热闹景象,经过3年多培育生长,上水沟村的10亩流苏茶迎来首个采摘季,当地茶农趁着晴天繁忙地采收茶叶,大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流苏茶俗称糯米茶,茶瓣呈狭长线状,馨味宜人。据《中国经济植物志》记载,流苏茶是以植物流苏树的花或叶子制成的一种养生茶,味道清香,消暑止渴,保健功效出色。同时,茶渣可治疗胃病和小儿腹泻等疾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2016年8月,为推动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珍珠泉乡政府根据区域气候特点和地理环境,多方引资,联合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上水沟村进行流苏茶项目示范和推广,大力发展流苏茶产业,助力村民就业增收。

在上水沟村流苏茶示范园内,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茶树昂首挺立、郁郁葱葱。几名茶农穿梭于墨绿色的茶田中,娴熟地采摘着一颗颗金贵的嫩芽。

低收入农户黄皂莲是地道的上水沟村人,在建立流苏茶示范园前,他们一家人守着家里的6亩多地种植传统农作物,一年下来,收入甚微。2016年,流苏茶“走”进小山村,黄皂莲便将自家的3亩地进行流转,除了每亩地一年1000元流转费,黄皂莲在示范园里找到一份工作,成了

## 珍珠泉乡流苏茶迎来首个采摘季

文/刘嘉豪

“有固定工资”的人。

“以前,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现在不一样了,除了土地流转费,每年一开春,我就能到茶树地里干一些除草、浇水、施肥工作。5月进入采摘季,每天都能有100多元收入,一年到头,能攒下不少,日子过得比以前宽裕多了。”黄皂莲高兴地说。

在上水沟村,像黄皂莲这样,在流苏茶示范园里实现就业的低收入农户有20余人。茶产业发展,不仅拓宽了低收入农户就业渠道,还解决了当地闲散劳

动力就近务工问题。珍珠泉乡上水沟村第一书记时艺民告诉笔者,茶树栽种下去后需要人来管理,而上水沟村的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已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除小孩和妇女,就是60岁以上老人。对此,上水沟村委会特别聘请几名村民到流苏茶示范园帮工,为茶树整枝除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尝到茶叶增收的“甜头”。

“小身材挑大梁”。一片片释放着清新气息的茶叶,带给上水沟村人增收致富的希望。今年,上水沟村在种植成功10亩流苏茶基础上,将种植规模扩大至15亩,进一步提高了茶叶产量。据统计,待茶园丰产期,每亩地可产茶约5公斤,暂估价约为1200元/公斤,每亩毛产值约6000元,除去养护费用,每亩净产值约2000元,远高于普通农作物产值。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流苏茶示范园的维护保养力度,提升园区周边环境。同时,加强流苏树生态文化宣传,提供采茶、品茶等系列生态文化产品与体验服务,做好宣传推广,不断提升流苏茶产业效益和影响力,力争做出产品、打造品牌、打通销路,努力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推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旅游增收,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艺民说。

(作者单位:延庆报)



##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东辛店村

### 一、基本情况

全村农户总数 130 户 273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81 户 189 人,残疾人 40 人,60 岁以上老人 60 人。全村农户劳动力 180 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121 人。村庄距怀柔城区 80 公里,距北京城区 130 公里。

### 二、产业情况

全村耕地面积 309 亩,主要种植玉米 200 亩。林地面积 20000 亩,主要种植板栗 270 亩。

### 三、发展思路及帮扶需求

**发展思路:** 一是计划成立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培训提高种植技能,贯彻绿色生产理念,提升产品质量;二是计划发展适宜村庄条件的特色林下经济。

**帮扶需求:** 一是成立合作社的培训、指导和支持;二是传统板栗、玉米种植的品种改良、技术指导、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支持;三是发展林下经济的适宜品种推介、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

### 四、联系方式

村书记:李玉友 联系电话:13716683129

第一书记:孙尚德 联系电话:13911508873

##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大沟村

### 一、基本情况

全村农户总数 56 户 181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31 户 89 人,残疾人 30 人,60 岁以上老人 60 人。全村农户劳动力 100 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36 人。村庄距怀柔城区 70 公里,距北京城区 130 公里。

### 二、产业情况

全村耕地面积 234 亩,主要种植玉米 200 亩。温

室大棚面积 34 亩(57 栋),主要种植玉米。林地面积 12000 亩,经济作物有板栗 13000 余棵。村内有闲置农宅 36 个,可用面积共 7200 平方米。

### 三、发展思路及帮扶需求

**发展思路:** 发展集垂钓、养生、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业。一是村里有一处富硒天然山泉水,常年不干涸,计划对泉水进行开发;二是计划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建设亲水平台、湿地,发展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三是计划对闲置农宅进行改造,建设休闲民宿;四是计划将村庄特产板栗、山核桃等,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

**帮扶需求:** 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整体规划设计、山泉水等旅游资源开发、闲置农宅改造、旅游项目策划、宣传推介等方面的支持。

### 四、联系方式

村书记:王志文 联系电话:1371685945

第一书记:许阳 联系电话:1331137155

##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北湾村

### 一、基本情况

全村农户总数 65 户 200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48 户 98 人,残疾人 23 人,60 岁以上老人 80 人。全村农户劳动力 100 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51 人。村庄距怀柔城区 65 公里,距北京城区 130 公里。

### 二、产业情况

全村耕地面积 551 亩,主要种植玉米 523 亩。村内养殖羊 426 只。有闲置农宅 25 个,可用面积共 1500 平方米。

### 三、发展思路及帮扶需求

**发展思路:** 一是种植传统特色小杂粮,遵循有机生产标准,统一管理、销售,并开发旅游产品和特产食



品;二是对现有多处闲置大棚更新改造,种植特色粮食作物,为来东川沟旅游的游客提供采摘、美食等体验;三是村庄有多处石头房,是一大特色,计划引进社会资本修缮改造,保持原有特色,内部进行满族民俗风情装饰,打造满族特色风情民宿。

**帮扶需求:**一是发展休闲旅游业的规划设计、石头房改造、食品加工和烹饪技术、宣传推介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农业种植技术培训、管理技术培训、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支持。

#### 四、联系方式

村书记:王仁学 联系电话:13910973255

第一书记:鲁 剑 联系电话:13701319399

### 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北干沟村

#### 一、基本情况

全村农户总数 63 户 165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32 户 57 人,残疾人 24 人,60 岁以上老人 30 人。全村农户劳动力 92 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40 人。村庄距怀柔城区 85 公里,距北京城区 135 公里。

#### 二、产业情况

全村耕地面积 184 亩,主要种植玉米 115 亩。林地面积 8717 亩,主要种植 5000 株太平果、5000 株板栗、2000 株本地毛桃,还有部分野山杏。

#### 三、发展思路及帮扶需求

**发展思路:**一是村庄山场广阔,多处泉眼遍布山间,生态资源丰富,计划寻求社会资本共同开发旅游、影视外景场地拍摄等项目;二是计划林下开展中草药经济作物种植;三是计划打造特色农副产品,如野生蘑菇、玉米面煎饼、玉米面条等。

**帮扶需求:**一是村庄生态旅游资源的合作开发;二是特色种植的技术指导、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特色农产品开发方面的支持。

#### 四、联系方式

村书记:肖富德 联系电话:13520913593

第一书记:王利军 联系电话:13911787362

### 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

#### 一、基本情况

全村农户总数 178 户 394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91 户 184 人,残疾人 64 人,60 岁以上老人 100 人。全村农户劳动力 230 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66 人。村庄距怀柔城区 35 公里,距北京城区 95 公里。

#### 二、产业情况

全村耕地面积 150 亩,全部种植玉米;林地面积 560 亩,主要种植核桃、栗子 350 亩,年产量 10 吨。村内特色养殖藏白鸡 3000 只,年产蛋 1 吨。村庄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箭扣长城环绕在村边,京北第一峰黑坨山位于村北,山上有泉眼 1 处、炭窑遗迹 3 座、原生态民居 6 座。村庄现有民俗旅游户 43 户,闲置农宅 20 个,可用面积共 2000 平方米。村庄有种植、养殖等合作社 5 个。

#### 三、发展思路及帮扶需求

**发展思路:**发展以“登黑坨山、观箭扣长城”为主的乡村旅游业,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推广宣传、技能培训等,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帮扶需求:**一是需要帮助编制村容村貌建设规划和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二是希望与社会资本合作开发黑坨山旅游资源;三是需要对黑坨山推广宣传,提高知名度,吸引游客;四是希望引入社会资本将闲置农宅改造成民宿酒店;五是需要对村民种植技能、旅游接待技能等开展培训。

#### 四、联系方式

村书记:张桂红 联系电话:13716370639

第一书记:任献策 联系电话:13718734889



### ► 大兴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农业保险工作

一是加强调度统筹,减少农户负担。大兴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种植、园林和经管等部门加强工作督导和调度,及时向各镇传达市级最新政策,组织各镇、各保险公司做好工作对接,确保各村和相关农业园区愿保尽保。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由中央、市、区等各级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90%,投保人仅承担保费的10%;同时,对西瓜等区内特色产业险种和低收入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由镇级再给予一定补贴。

二是聚焦重点险种,灵活组织承保。今年2月以来,大兴区先后遭遇较强雨雪和大风等天气,大兴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各保险公司提前行动,从农户、生产者等实际需求出发,优先聚焦温室大棚、果树等易受灾险种,采取“一户一策”方式承保,确保相关企业及时起保,避免出现承保“空档期”。

三是强化数据应用,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北京市农业保险管理及信息服务平台和北京市设施农业台账综合管理平台资源,通过调取分析相关数据,帮助各保险公司了解各镇、村农业生产种植和设施农业规模等情况,进一步提高承保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避免出现遗漏或重复投保等问题。

四是持续创新,扩大保险覆盖面。大兴区现有集约化育苗场22家,大兴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保险公司到育苗企业进行调研,已形成了瓜果及蔬菜育苗保险,由市级纳入特色创新险种范畴。今年以来,已试点承保瓜果、蔬菜等种苗1300余万株,为相关育苗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941.5万元。

截至目前,大兴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农户达9018户,涉及22个险种,实现总保额4.3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5%),总保费1949.7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9%)。其中,种植业承保面积7.83万亩(较去年同期增长6.5%),涉及西瓜、果树、温室大棚、蔬菜、小麦等21个险种;养殖业承保肉牛333头次。

(大兴区农业农村局)

### ► 天竺镇对灵活就业人员开展远程报告分批辅导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灵活就业保险补贴经办流程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20

年7月1日起,享受人自批准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次月起,应每三个月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如实报告本人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等灵活就业情况。为使顺义区天竺镇内享受灵活就业政策人员熟练掌握远程报告操作方法,并保证疫情期间公共安全,天竺镇社保所采取分批培训的方法,于5月11日至19日,分批为330名享受人员开展操作培训。

为确保安全,天竺镇社保所严格控制每批培训的规模,确保每批培训人员不超过30人,并要求参加培训人员持北京健康宝、测量体温、佩戴口罩入内,两人之间至少间隔一个座位入座。培训后,灵活就业享受人张某对工作人员说:“以前报告就业状况,老得往社保所跑,现在好了,你们培训完了,我就会用手机报告了,比之前方便多了。”

(石欣跃、段云鹤)

### ► 后沙峪镇召开2020年对口帮扶巴林左旗工作对接会

5月19日,顺义区后沙峪镇召开2020年对口帮扶巴林左旗工作对接会。顺义区发展改革委一级调研员凌春华、燕京啤酒集团办公室主任孙奕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镇领导冯江全、刘东升参加。巴林左旗旗长孟和达来,旗政府、发改委、扶贫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视频会议参加。

会上,孟和达来对后沙峪镇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巴林左旗将进一步完善与后沙峪镇的协作配合机制,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工作,精心组织对口帮扶项目,重点做好产业合作和就业协作,不断催生促进发展的内动力,以扎实的工作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扶贫工作在阳光下进行,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检验。后沙峪镇党委委员、镇人大主席刘东升强调,后沙峪镇将以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更过硬的作风助力巴林左旗实现脱贫攻坚。镇党委书记冯江全要求,要做好两地项目管理,积极推进资金拨付、手续办理、档案留存等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国考”;要加强资金统筹和使用监管,提高协作资金使用效益,把资金落到项目上,把项目落到贫困人口上,加快项目进度,早完工、早见效、早受益;双方要加强交



流对接,推动两地不断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水平,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肖永兴)

### ►桥梓镇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

日前,怀柔区桥梓镇环境办指导24个村和茶坞铁路社区对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进行修改完善,将垃圾分类纳入其中。各村和社区在村居民代表大会上,将垃圾分类写进村规民约的提议得到了村民代表的一致赞同。

将垃圾分类写进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是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约束,进一步强化村民意识,让村民将垃圾分类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习惯。日前,该镇24个村和茶坞铁路社区不约而同地将垃圾分类写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根据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村居民要积极配合宣传并执行垃圾分类要求,营造“美丽清洁家园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凝聚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共识。家家户户做到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垃圾分类投放,不随手乱扔垃圾,杜绝乱投、乱倒现象发生。严禁占用道路及公共场所堆放生产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确保农村、社区道路畅通、路面整洁。

当前,桥梓镇大力推进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营造靓美的生活环境,垃圾分类与处理是关键一环,做好垃圾分类,让环境越变越美的同时也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农村观念相对陈旧,垃圾分类意识较弱,需要全方位反复宣传。为了让垃圾分类宣传更具特色,促进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桥梓镇主管垃圾分类负责人表示,垃圾分类管理是大势所趋,农村垃圾分类管理难度较大,相关知识亟待普及,将会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结合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积极引导村民破除生活陋习,自觉养成良好习惯,共同营造农村生态人居环境。(丁志友)

### ►“小手拉大手”共建环保北房

5月28日至31日,怀柔区北房镇组织开展了为期4天的垃圾分类系列活动,22名北京恩信幸福学院学员作为志愿者,携手北房镇小志愿者,将丰富多彩的“小手拉大手”活动变成了全镇居民的垃圾分类和

环保知识小课堂。引导居民从自身做起,以孩子带动家庭、以家庭带动社区、以社区带动社会,全民践行绿色生活理念。

活动中,北房镇在裕华园社区的垃圾站点设立引导员,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引导居民从日常小事入手,积极践行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理念。志愿者们入户宣讲,亲手在居民家里贴上爱的便利贴:“人一直在大地之上,为地球尽一份心力,是本分事儿,也是使命”“做环保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大、小志愿者们一同参观了垃圾焚烧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怀柔区垃圾填埋的现状,激发大家的危机意识。

5月31日,在全镇居民的支持和参与中,活动达到高潮。大、小志愿者共同练习并表演手语舞、观看环保主题“快板”,最后开展的“环保大市集”活动,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变身环保大富翁,制作有趣的“环保酵素”,并和小志愿者约定定期过来看看“环保酵素”过程,90天制作成功。此项活动增强了小志愿者们垃圾分类的意识,同时现场手绘环保小报、利用再生骨料和空气凤梨组合制作桌面小盆栽,大家在生动的游戏中了解垃圾分类后取得的成效,坚定了“生活垃圾要分类”“让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环保理念,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生态环境,成为北房人的共识。

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房镇陆续开展了垃圾分类“进学校、进家庭、进机关、进公共场所、进企业”宣传活动,根据不同场所、不同对象,印发宣传彩页、海报等多种宣传材料8000余份,利用广播、微信公众号、LED显示屏等方式宣传,创新采取问卷形式激发学习兴趣,构成线上线下、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阵地,让分类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同时,选定大周及裕华园为示范村(居),发挥示范效应。大周采取入户收集方式,每户从源头进行分类,分别放置在门口的垃圾分类箱中,再由保洁员集中收运。裕华园专门设立了由楼门长、宣传员、指导员、分拣员组成的管理队伍,逐步提升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效果。目前,北房镇配有分类指导员113名,配有桶站104个,其他垃圾桶321个,厨余、可回收、有毒有害桶各100个,除有毒有害外垃圾,其余垃圾由环卫公司统一清运。(李洪亮、程佳琦)